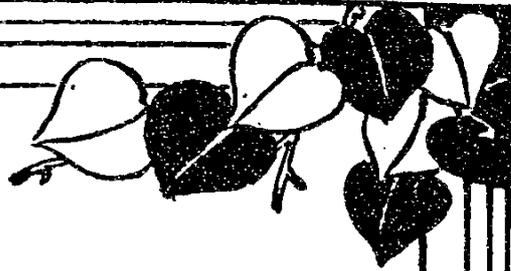




百花亭畔

如此這般錄之一



一之錄般這此如

百 花 亭 畔

著 高 語 罕

海 上
館 書 圖 東 亞
行 印

1 9 3 3



序

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因蘇報案下獄，他從獄中寫給吳君遂張伯純的信道：

「……訴畢，錢程二子，自辯本無干涉，仲岐代父入獄，亦以爲大眾所知，當可開釋。弟與威丹，罪狀自重。其所控我，自革命逐滿外，復牽引『玄暉』、『弘曆』、『載湉小醜』等語，以爲干犯廟諱，指斥乘輿，不知律師如何申辯。龍積之無事可執，乃云係富有稟會匪，犯事在漢口。情節支離，不值一辯。」

(1) 其致吳君遂書又說：

鄒君本是同志，積之議論亦復水乳交融。陳仲岐略有怨尤，亦尙寧靜。無如程錢二子攪擾不安。錢保仁本鎮江流氓，積之在鎮江時，曾雇爲傭役。後以誑騙銀錢一案，投入教會。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當張園演說時，滿口胡言，自命爲三點頭目。且與積之書云：「爾勿敗我事，否則爾首領不保矣。」以是積之不敢胡言。夢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詐。常言某處有一金佛，可往取歸，一生吃著不盡，而夢坡竟信之，欲以蘇報交彼辦理。幸仲岐窺破其詐，得以保守，然已謫去墨銀三四百圓矣。前日禹稽亭來，彼亦相識，輒妄言我與張伯純曾在某處謀開礦山，礦中五金皆具，似伯純亦嘗受其欺者。而其人識字甚少，所書俗語，亦爲拉丁文，大悲呢，不可猝解。不知夢坡何以稱之？」

章行嚴君于此兩書後曾這樣地寫道：

「蘇報案爲革命史中大獄，當時甚爲煇赫。愚因是報中主撰，名捕獨免。此辦案者江蘇候補道俞恪士先生特私於愚，愚恥之而無如何。章鄒本可颺去，故意就逮，以示風節。獄中寧靜之態，讀此兩書，可見一斑。是案本六人，號『六君子』。實則除章鄒外，惟龍積之略有時望。餘三人，一陳仲岐，爲蘇報館主陳夢坡之子；一陳吉孚，爲館中賬房；一則錢保仁也。審此革命黨濫竊時名以終者，夫豈少哉？（圈點係著者所加）錄竟憮然！」

——甲寅週刊第一卷第四十三號

（3）
「革命黨濫竊時名以終者，夫豈少哉？」我深有感於章先生之言而「憮然」之情，且有甚於章先生。因爲這個時代的我們都是在革命的雲圍

氣與革命的戰場中生長出來的，我們所親見親聞同親自參加的革命演劇，實有許多可泣可歌的偉大的悲劇；也有許多可笑，可惡，可恨，並且笑得你肚子痛，惡得你心裏作嘔，恨得你「眼中流血，心內成灰」的悲劇與滑稽劇！這劇中的脚色，有許多成了英雄，有許多作了烈士，也有許多成了偉人。

我因是發願把我二十年前所親見親聞及親身參與的革命中的軼事，敘述出來，名曰「如此這般錄」，如此這般錄共分三集：

第一集 百花亭畔 以徐錫麟刺殺恩銘的革命陰謀的事

實爲主要實料；即本書。

第二集 病中 以熊承基砲兵營起義事實爲主要材料。

第三集 青年軍始末紀 以辛亥革命後的安徽獨立運動

爲主要資料，而敘述則以青年軍之產生，發展和消滅爲線索。

這三部小冊子所敘述的三件革命的史實，也就是我個人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上所經過的思想，行動上的變化。我不是什麼偉人，我也不是什麼思想家，更不是什麼革命文學家。我只是在這二十年的革命的大潮中滾來滾去的一點一滴，而且是極平凡的一點一滴。但是唯其一點一滴，惟其是極平凡的一點一滴，他所親見親聞與親自參加的事實，或許於一切平凡的，普遍的社會更較爲親切，那末，這種小冊子，謂之爲『革命軼事』也可，謂之爲『我的生活』之片影也可。

再者，書中所敘的人物，遇必要時，往往將其真姓名隱去。並不是『爲尊者諱』或『爲親者諱』實在因爲我們只須在某一時期，某一地方，某一社會有這末一回事有這末一個人就得了。至於其人爲誰，倒

不
關
重
要。

著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在柏林。

(1)

十九世紀的末年，中國有兩件大事：一件是『戊戌變政』（一八九八年）；一件是『庚子的義和團的暴動』（一九〇〇年）。這兩件事都是發自那時的首都及京畿附近的地方。我生長的地方是在皖北的一個鎮市上，而我那時還不過是十歲至十三歲的孩子，論理是與這兩件歷史的波動不會發生什麼直接的關係的。但是我們這個鎮市在津浦路尚未修築以前，蚌埠還是一片荒地以前，牠的確是皖北的一個唯一的商埠。那時淮岸的鹽和各省及外洋的雜貨，均取道長淮由我們這個鎮市，輸送皖西豫東各地；而皖西豫東各地的土產如六安的茶，麻竹，木，穎，六，霍等處的米，麥，河南周家口等處的穀糧與牛皮等等，也必須



經過我們的鎮市出口。所以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話，叫做：『七十二道山河歸正陽，』可見牠是一個水陸的通衢。本地有鹽釐總局，有稅關；稅關直轄於淮泗兵備道；鹽釐總局則隸屬於兩江總督；管轄民事的有三府與巡檢司，武官則有把總，而長淮水師統領也駐紮此地。我們看了這種文武官吏的組織的複雜，更可證明牠在安徽，尤其是皖北的商業上，政治上的重要。正陽還有一種特殊的形勢，就是牠有城池。本來中國的縣治才有城池的建築，在鎮市建築城池，要算是正陽的特性，而且這個城池還有牠的一段光榮的歷史。因為這個城是前清咸同之交，在皖北樹起反抗壽縣大地主孫家（孫家一族的）壓迫的旗幟的首領苗沛霖造的。他當時起兵反叛時，正陽成了他的重鎮；他的大旗主米萬龍就駐在這裏，因此他就下令全城壯丁，一齊從事築城的工作，不幾個月就

把一座方圓數里的城池修築好了。北門外二里許，有一箇高岡擁護着，名叫北壩根，南門外也有一道高堤環護着，名叫南堤。北堤上有三官廟，南堤上是鹽倉，且建有大王廟，淮南書院，又名羹梅書院，也附設在裏面。南北二堤，每當春水泛濫的時候，堤邊楊柳垂垂，從南堤到北堤沿正陽城西的長淮十里，一眼望去全是商船，真是「帆檣林立，烟火人聲，日夜不絕。我們家鄉所謂體面商人即紳士們宴集賓客都在這兩個堤上，因為牠們是總括全鎮風景的名勝，所以牠在內地是一個消息最靈通，得風氣最先的地方。

有一天大約是上午的時候，我正提着水壺上街泡開水，街上的早市正集，人很擁擠，忽然街道上的人向兩旁邊讓，又聽見有喝道兒的聲音，從人叢中破空而來，我就站在茶館門口呆呆地望着，只見前面幾個

穿號衣的督銷局的護勇，領着幾乘大轎，前面一乘是綠呢幃子，後面的都是藍呢幃子。我曉得綠呢幃子的轎非候補道的官階不能坐，這裏頭坐的一定是個大官兒，所以我就特別地注視着牠。待牠到了面前，凝神一看，却是一個女子，用她的素絹手帕，不住地遮着她的面孔，好像是在拭淚，身上穿着玄色的衣服，頭上一點首飾也沒有。臉子的好醜，年齡的老幼，固然看不明白；然而從她的手帕子的閃動中，露出一角的春風來，曉得她一定是個美秀而文的大家閨秀；當時的正陽關也只有督銷總辦是唯一的大人物，又有督銷局的兵丁爲證，那自然是督銷局的什麼人——太太姨太太？或小姐？但究竟是什麼人呢？爲什麼在哭呢？又上什麼地方去呢？究竟做什麼事呢？這些問題，馬上湧上心頭。兒童的本能的好奇心就把我出來泡水的使命忘記了，不自覺地跟在轎子後邊，雜在

人叢中向前奔。這些羣衆看見轎子裏的人在哭，也就不知不覺地一聲不響，彷彿現在什麼『靜默五分鐘』似的，靜悄悄地跟着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意思就是在詢問，『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有的要表示他的先知，說是去上墳；有的說是到什麼大紳士家吊喪，我却不能判定他們誰說的對。不一回快到了南堤了，我忽然一想，『不對；我出來半天了，水還沒有泡，不趕緊回去，當心我的一身皮。』因爲我的母親的家規非常嚴厲，一點不對，不是鞋底，便是棍子，所以一步做兩步地望回趕，趕到茶館去泡水。我們正陽公行門口的茶館就是現在上海的國際無線電台，地方上有什麼事情發生，不消片刻，就可從茶館裏加上人工傳徧全鎮。我一到茶館，就聽見一片嚷聲談論正酣：

『你不知道：她們是擺祭的。』

有的又說：

『那頭頂轎子，就是總辦小姐！』

說罷，大家從新交頭接耳地，輕輕地道：

『革命黨！革命黨！這位總辦小姐的丈夫是個革命黨！前天在北京城造反，被皇帝拿着了，三堂會審，判了個大逆，就地正法！』

這位小姐得了信，已經哭了三天三夜。總辦不得已，在南堤給他設了靈牌，讓這位小姐去祭奠哭靈咧！』

我泡了水，出了茶館，帶着這些混亂而悲慘的消息回到家中，一進門就被母親大罵一頓，幸而還沒有挨打。但是這天是我一生最可紀念的日子，因為我在這天第一次聽見『革命』這兩個字。事實是這樣的：正陽的督銷總辦是沈瑜慶，他的女婿名叫林旭，是個新科舉人，在京城結識

了康有爲、梁啟超等一般維新黨。康有爲等受知於光緒皇帝，銳意變法，不料爲袁世凱所賣，光緒被禁，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下旨拿辦維新黨，康有爲、梁啟超逃了，譚嗣同、林旭等六人被逮被殺就是所謂戊戌變政的六君子。林氏被捕的消息傳到正陽以後，他的丈人沈瑜慶卽刻電京懇托中樞營救，又派他的天津住宅的家人親往獄中探視林旭；林旭就把他的白綢襯衫扯了一塊下來，咬破中指，寫了下面

「不捐此官，不招此禍」

八個大字的血書，交給來人帶給他的丈人和住在他岳家的妻子。但林旭這話究竟怎講呢？原來林氏中舉之後，以少年科第的貴公子出身，自己又有點才華，老丈人自然歡喜他這位東床駙馬直上青雲；況且他又是在掌握着財政機關，當時的正陽鹽釐，是兩江數一數二的紅候補道。

的肥缺，一年總有十幾萬的出息；這在現在財政界的巨子看來，真正不值得一顧，然而在三十年前，資產階級開始抬頭還未掌握政權的中國，也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剝削人民的機關，沈老丈所以樂得拿一注錢來替他的佳婿捐了一個部缺。後來同康有爲談得投機，便得到終南捷徑，光緒皇帝特殊優遇，賞賜四品京堂，軍機處行走，傳旨陛見。這就是林氏在獄中寫出這八個字的原因。原來林氏沈氏都是閩南望族，沈總辦這位小姐，據說，她的詩畫都很名貴，人又美好；她和林旭，不愧爲「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士女班頭。」然而她的夫婿既然做了「六君子」之一，爲他的政治主張而犧牲，她也就偶然地合了中國一句俗話「紅顏薄命」，做了未亡人。她的父親既然悲悼他的女婿之不得其死（在他們的觀點上，是應該如此的），又憐憫他的女兒之「文君新寡」於

是就暗暗地在南堤設了祭壇，教他女兒去朝北望空遙祭。我看見的在那綠呢大轎裏面的美人就是她，正是到南堤哭祭他的丈夫殉難的她。這時，我才十歲光景。

又有一天，也是上午，我正從家裏出來到隔巷王老伯家上學讀書的時候，剛出我們的巷子，就碰到一羣人跟着幾個外國女鬼子（這是我們當時稱呼一般外國人的口頭）從南望北走；這幾個女鬼子都穿着深藍色的嗶嘰長袍，戴着雪白的漂布折疊的帽子，項上圈着一串數珠，正當心掛着一個十字架，我那時還不曉得上法場是個什麼樣子，但據我平常聽書和聽故事的知識推想起來，怕不是這就是拿幾個外國女鬼子上法場？心裏正在疑惑，只聽見後邊一羣人在亂喊：

「打洋鬼子呀！」

「大師兄，紅燈照……」

「扶清滅洋，義和團……」

「刀鎗不入，只要你相信，口中念念有詞……」

那幾個外國女鬼子，本來生得就白胖森森地，這末一來，臉上更是變成死白色，顛巍巍地走着，連頭也不敢回，一直走到巡檢衙門，她門彷彿得了救似的，指天又畫地，嘴裏也在那念念有詞，中門一開進去了。羣衆真是「順命百姓」，大家攢來擁去，只在衙門口仰着頭兒朝裏望，口裏雖然喊着「打洋鬼子」，脚下却不望前進，手裏也沒有動作，過了一回散了。原來這幾個外國女鬼子，都是在潁州、霍邱、潁上一帶傳教的天主教師，只因爲北方的義和團樹起「扶清滅洋」的旗幟，驅逐盤據中國的外國人，尤其是反對教士；他們捉到教士是不肯輕輕放過的。這種

暴動的風波從京畿開始，一直蔓延直隸，山東，河南諸省，牠的洶湧的浪潮，差不多濺到江蘇，安徽的北部。地方貧民也有蠢蠢欲動之勢，於是霍邱，穎上等處的外國的教士都離開各教堂，打算逃回上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前敵大本營。）想回上海，必然要經過我們的鎮市，取道浦口，渡江到南京，她們才可脫離危險的境地。她們到巡檢衙門，是求地方官保護。地方官在中國實在有莫大的威靈，外國鬼子得了保護，羣衆也就慢慢地散去了，我也就回頭去上學。街談巷議自然傳說了許多『紅燈照』的神話，就現在看來，自然不值一笑，然而在當時，我却從那些羣衆的無意識的笑罵聲中，本能地在我的幼稚的天性中第一次深深地印下了『滅洋』的印象，用現在的科學的術語說，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印象。』這自然只是一種極隱約，極曖昧的蛛絲馬迹，也許對於我

以後的行爲及思想，沒有直接的影響。這樣說來，這一篇故事，好像是有意的穿鑿附會。然而事隔三十多年兒童時代的情形，都成了模糊不清的惚兮恍兮的影子，只有這兩件事，還是宛在目前，情景如畫，我要敘述我所親歷的社會生活之偉大的紀念，就不得不追溯到牠們身上來。

二

原來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牠的閉關自守的萬里長城，已被最先進的帝國主義者英國的兵艦大砲轟開了。從此以後，牠的落後的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國際的市場上和戰場上都無往而不形見勢絀。而甲午一戰，即中日之戰（一八九四年），所有中國的海陸軍，尤其是海軍，滿洲政府特派李鴻章蓄意經

營的海軍艦隊，完全覆沒，更使中國的朝野上下，張皇失措，而全國的人心亦漸漸覺悟。滿洲政府的腐敗政權，即代表滿洲貴族與全國大地主階級的封建形式的連合政權，絕不足與圖存。又看見歐、美、日本各列強的政權形式是君主立憲，或民主立憲，中國的工業那時還在幼稚時代，資產階級方才有了要求革新的意識，他們最好是效法日本，擁立君主，宣布立憲。當時一般人的眼光，只注在帝國主義的船堅砲利，大家都以為只要國富兵強，也就可以跑到帝國主義者隊裏，和他們並駕齊驅，同樣地侵略弱小民族與貧民階級，所以「富國強兵」是那時的舉國一致，至少是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一致的政治口號。「戊戌政變」就是這一口號之行動上的企圖運動。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就是這一運動的出台人物。這一運動的內幕中，牽連人物很多，如張謇、程德全、翁同龢、沈

會植等等，皆是其中主要脚色。這個運動雖然外面罩上一「保皇黨」的外衣，然而確是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上，在政治上抬頭的第一聲。牠在形式上雖然好像是調和，妥協，好像是沒有太平天國那種反抗滿清之激烈的行動，然而牠知道跟着歐，美，日本資產階級之民主政治的脚根轉，從資本主義的立場看來，這正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進一步的具體的表現。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是鴉片戰爭以後，南中國的農民反抗滿清並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可以說，牠是鴉片戰爭演成的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與夫滿清政治之腐敗的直接果實；戊戌政變則是辛丑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所形成的中國士大夫階級，智識階級，換一句話說，即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要求政治改革的直接行動，也就是中國屢次敗北於帝國主義的直接產物。

太平天國的南方民衆的革命運動既被滿洲政府撲滅了，而康梁的立憲救國的政變又被破壞，這時最感受滿清政府腐敗不可救藥，又爲外國帝國主義者所蹂躪所最難忍受而絕望的，是北方農民。北方的經濟組織大部分還滯留在商業資本主義所利用的封建剝削的形式之中，農民的情緒自然是很原始的，所採取的反抗形式自然也是很原始的；『大師兄』『紅燈照』『扶清滅洋』種種組織與口號，絕不是偶然的。在資產階級的政權當路人及其學者看來，這種舉動自然不文，然而牠的革命的，反抗帝國主義之民族的與階級的歷史的意義，實在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一來是，牠給我們中國民衆一個偉大的反抗的興奮；二來是，牠給我們遺留下許多教訓；三來是，從茲以後，使中國全國民衆對於滿清政府完全絕望；四來是，這種暴動不但對於帝國主義

在華的勢力與滿清的政權，激烈地在行動上加以否定，牠並且否定了康梁保皇黨人的君主立憲論。不過這種結論，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結果，但在當時一般士大夫還沒多少有這樣自覺的觀察和認識。況且康有為和梁啟超以他們的卓越的文學天才宣傳歐美日本的君主立憲救國論，當時全國思想界，尤其是青年，沒有不受他們的影響的，尤其是梁啟超的影響，我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新民叢報，中國魂，在那時就是我們的聖經。康梁原來是君主立憲黨，他們所宣傳的理論，自然也是君主立憲論。他們只求在現存的社會基礎上，要求政治的改良，即所謂『變法』『維新』。然而牠的結果却與他們所預期的恰恰相反，就是經過他們這一番變法的運動——聯合北洋軍閥的始祖袁世凱，廢慈禧太后，擁立光緒帝（德宗），效法歐美與日本，宣布君主立憲——和他們的理論宣

傳，深深中於人心，於是就大違他們的本意，起了以下的幾種作用：

(一) 全國上下，至少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與所謂士大夫，智識階級的心理被牠震動了。他們曉得在如許腐敗的國情之下，必須要求一個變革，才有圖存的希望。

(二) 一般激進的分子，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學生，甚至鄉村中的開明的地主都爲當時的『富強』保國論所掀起。他們追源歷來戰敗求和，割地賠款的禍始，自然要歸到滿清政府身上，於是而有種族革命的運動。這一運動不是他們的創造，而是太平天國之革命戰爭的繼續與發展。他們與康梁派在政治的形式上，似乎是恰恰相反，然而從社會學的立場來觀察他們都是一樣的，不過資產階級中間的左右派罷了，因爲保皇黨與當時的革命黨對於政治的一般形式，雖有

『君主』、『民主』的對立，然而若是我們一考察歐美與日本的立憲史與政治史，就曉得他們中間並沒有不可踰越的深淵。誰人能說君主立憲的英國比民主立憲的法國和美國更野蠻，更專制，反過來看，誰人又能說，民主立憲的法國與美國比君主立憲的英國與德國更自由，更平等？然而在當時這種種族革命——排滿——的思想，確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中急進的行動口號，和康梁的保皇黨不可調和的對立，然而牠正是康梁等的維新運動以後之必然的結果。

(三) 當時還有一個共同的運動由是而生，就是清廷自身也覺到不能不有一種行動藉以保持他們萬世一系的江山。這一運動正是維新運動直接所促成，所擴大，也可說是甲午戰後之直接的果子，就是廢科舉，興學校，練新軍，大派留學生出洋。清廷雖然把康梁的革新運動

的政變鎮壓下去了，然而却不能遏止全國當時要求改革的鼎沸的人心，所以興學校練新軍這兩件事，在當時是兩個吃緊的行動口號，也就是清廷所不得不漸次推行的兩個政策。

我初進學校的時候，是十七歲，這時正是從科舉到學校一個過渡的時代。我進學校（經世中學）的第二年冬季，我們州裏舉行院試；照例要考院考的，必須先過州考與府考。縣或州考與府考之中，名列前十名的，叫做「前十」，列第一名的，叫做「案首」。州縣考與府考的案首，到了院試，一定要進學的，前十名也有十分之七八的進學的希望。若是州考府考都不曾考過，到了院試，必須先在州府經過補考，然後才能過考，但是雙補考的童生，很少有進學的希望。不過我們經世中學的同學回去考試，都攜有鳳陽兵備道的公文請州府准予補考，優加錄取，着實佔

(10)

了面子。但回想我從前回去考院考，也有一些故事，乘這個機會，略略地敘一敘。我回去考院考的時候，從臨淮坐小民船到家，打算在家住幾天，才同人結伴到州裏去。那曉得一到了家，我的興頭便打掉一大半，因為父親籌不到一個錢，母親也是束手無策，兼之我們從老家裏逃出來以後，父親還沒找到一定的職業，衣服手飾大都吃淨當光。我看了這個光景，決計不願去考了，和母親說，我要馬上回學校去，老實說，我當時對於考試實在不感興趣，這並不是說，我那時已深切地覺悟到科名的無聊，毋寧說是我自己曉得，到了場屋中，沒有一點把握，到不如自己見機而作，藉故逃了完事。伯伯，大媽自然是反對，祖母聽見我不能和不願去考，只是搖頭，一聲不響。房東家汪老丈本是一個放利債的人，但他很敬重我的母親持家謹嚴，曉得我這次回家是要到州裏去趕考的，又曉得我

們的考伴已經約好，一共八人；我的兒童時代的私塾先生程二夫子，我的父親的結盟弟兄的老弟蘇亦亭，我的表叔程少生，陳雲谷等七人，加上我一個。八人之中，算我頂年輕，在考場中，我是初試；他們都是考過十幾考或七八考的。我同他們結伴，算是我父親拜托他們；在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讓我去看看。相約既定，他們早已催着要動身，而我家還在拖延；汪老丈看出我們的神景，猜透我是在張羅盤川，他老先生很慷慨，親自送了三塊大洋給父親說，這給你家大相公做盤川，父親待要不受，却又不好辜負老丈這番好意；況且正在沒處設法，難得有此一舉，到是「雪裏送炭」，就謝了他一謝，收下了，說是以後奉還。我初聽見汪老丈送盤川，非常高興，後來一看，只有三塊錢，登時歎了一口氣，又在母親面前，表示不願去考，要馬上回到學堂去的意思。父親安慰道：

「你只管去，三塊錢你暫且拿去，到了州裏，我們還可從關上的聖廟裏分點考費，大約可以敷衍了。若果真是徼幸掛出來了，你打電報來，我馬上設法籌款親自送來……」

父親說得很殷勤。他考了一生，沒有進學，惹得外公外婆和母親每每在言談語句之中，表示一種缺陷，所以希望我這次去替他爭口氣。我沒辦法只得隨着那班老前輩的老童們到州裏去了。

頭一場是在大考棚裏考的，當時的大考棚同收容難民的席棚子差不多，雖有大小之不同，而其破漏荒蕪僅足以蔽風雨，是一個樣子。考棚裏放了幾十條長木几案，幾十條長木凳，每一條几案大約要坐十來號人。進場點名後，就領卷子。卷子上註有指定的座位號數，各就卷子上註定的號頭坐定，題目是用一個虎頭牌標示出來，由聽差官扛着巡行

各號考棚。這一場是一篇經義，題目我記不得了。我記得，我是先在自備的紅格紙上，把做的文章謄清後，再拿牠和卷子比起來，一行一行地抄寫，所以全篇沒有一個「添註塗改」。到了中時，算勉強交卷出場了。出場後，覺得很輕鬆，因為這末一來，我可算是完了一樁事，只待發案後，馬上動身回鳳陽，我斷定自己沒有希望，方寸之間，也就異常坦然，無挂無礙。所以發榜的時候，我看都不去看；不多一刻，我那七位老前輩看榜回來，一個個都「如喪考妣」地，垂頭喪氣，沒精打彩的，一語不發，不約而同地都各向床上一倒。還是我的私塾先生程二夫子比較平靜一點，擩着大嘴，笑蜜蜜地叫我道：

「士樹，你倒挂出來了！第七十一名。」

我還表示不相信的神情，他又重覆一句：

「不錯！七十一名；一共挂了七十二，你取在第七十一名。」

初聽見挂出來了，心裏也似乎一鼓；但馬上又冷下去；因為一共取了七十二名，我挂在七十一名，實數只進三十多名，那末，第二場一覆試，尾巴稍微一擺，就擺落第了，因此想道：與其被他擺掉，不如第二場不考，到識相點。但大家老前輩，都勸我鼓起勇氣去覆試。覆試一場是考「經古」；所謂經古在前是考詩賦，這一場因為試帖廢，故考策論及科學（科學是隨意科，聽與考者自己報名）；他們說，你既是學堂學生，就報考算學一試一試；我也糊糊塗塗的，當時在學堂，學到一次方程，我便報了一次方程。覆試一篇時務策，一篇史論，這一次是在學堂的大堂上坐的，比第一場在考棚裏清爽多了。題目出來以後，我又照第一場一樣，胡謔了兩篇，本來就算完卷；那知學台因我報的算學又特別出了兩個算學題目，寫

在牌示上送給我；又因爲全場只有我一個報算學，所以把牌示樹在我的旁邊，大家都輪着眼望着牠，又望着我。牌示上說：算學做好之後，再做一藝者爲完卷，我已經把兩藝做好，即使不做算學，也可完卷，但是我終是又把算學做了寫在卷子後面。文章做得自然不好，算學更是胡謔。因爲我報的代數，他却出題是中國九數通考的九章上的題目，我一點也算不上來，然而事情既已臨到頭上，管他媽的，橫豎闖上前去，我仍然創造了一個方程式，不論三七二十一畫了些等號，得數交了卷。第二場發案，我竟然高陞到第十七名了；以後我的胆子更大了，以爲以前那樣大的亂子都闖過了，第三場終覆試，自然更容易了。終覆試自然是決定的考試，然而我已有了經驗，不着慌了。這一場仍然是學台自己監考，只出一個經義的題目，這個題目我還記得是：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牌示上註明：『做一百字者爲完卷。』看來似乎很容易，但是我們多數人都不知道題目的出處，學台看見沒法，只得在牌示上寫出來，『出易經。』但是我們進場時，大半都沒敢帶『夾帶』，只有史老先生一個帶了一部五經備旨，大家向他借，他簡直如獲秘寶，那裏肯借，我只得『就題打滾』，集了一百多字，交卷。怎樣叫做『就題打滾』呢？大凡對於一個題目不得其講的，只得就字面敷衍成文，若果題目有『木』字，就把『木』轉來轉去，說些不着邊際的空話，猛一看來，似乎句句都通，按題講究却是毫不相干，這就叫做『就題打滾』。這一場也取了；這場既取，就決定了。家裏接到電報，祖母喜歡得又搖起頭來；母親還鎮靜，心裏雖然喜歡，但是人家恭賀她，她却慢慢地答道：『小孩子不懂得什麼，這也』

不過是祖宗的一點陰德所致罷了。」父親聽見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喉嚨裏作起嘔來，嘴裏嗚哩嗚哩弄不清。還是母親代他張羅好了，才得到州裏來看我。

這裏却起了兩個小小的波瀾：一個是送喜報的；他們聽說我家在鎮上開的又是錢店，又是布店，大概是個戶兒，於是頭報連夜到了，以爲至少要賞個三五十吊錢。打開門來，那個報喜報的猛然叫道：

「怎麼……」

原來我家只租了人家三間草堂，一間廚房，我父親和我的弟弟到州裏來了，家中只剩下祖母和母親兩人。見了下來報喜的來了，沒法，托了房東家的孫子，連忙把我的四叔找了來。一方面由我祖母起來和他講話，我母親則到廚房去熱騰飯給報喜報的人吃。報喜報的呆了半天又說道：

「不是說，你們府上又是錢店，又是布店嗎？怎麼？」
說到這裏又不說了。祖母道：

「是的呀，我們姓裏也有錢店，也有布店，但我們這一門子，現在窮了，沒有從前那種興旺氣象了！二十年來，我們鹽店巷子花馬留的O家，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報喜報的搶了一句說道：

「老太太，你不要敘從前的老故事了……」

她也不管，又接續地敘述我們家的興亡史道：

「他爹爹（皖北人呼祖父做『爹爹』）原來老弟兄八個，家裏那時又是鹽店，又是錢莊，又是油房，又是抄貨行，鄉裏糧食收的成倉的，但是「龍多四靠」弄得有事沒人管……」

那個報喜報的有點不耐煩了，嘴裏咕唧道：

「誰給你修家譜……」

這時我母親的膳飯熱好了，捧出來給他吃，才把他們的話頭打斷。報喜報的看者一大碗膳飯，一碗膳小菜，自然是悶不過，自己的希望完全打消了，算白跑一趟，在那裏自罵自地道：「禽姑娘的，算我倒霉！」然而這一個事實，沒有可以希望的事實，希望也自然就不會再有了。但是一口氣跑了六十里，肚子自然不大願意，在那裏叫了，這個事實也是最慘酷不過的，雖是膳飯膳菜，也只得很滿意地接過來吃了。吃好了飯，四叔也來了，大媽從房裏拿了一吊錢交給四叔，四叔把錢向着報喜報的面前一放，笑嘻嘻地道：

「對不起！家中實在艱難不過，這一吊錢拿着吃茶等着我家。」

大相公明年下科中了，再重重地賞。

報喜報的沒法，似乎想爭多一點，嘴動了幾動，又沒有出口，連忙說道：

「好了！好了！」

拿起一吊錢，告了辭，頭也不轉地走了。

另一件是州裏的廩保，也認我是一塊肥肉，他們每逢院考，遇着他們所保的童生進了學的肥戶，是要發一筆小財的，但是對我他的夢又做錯了，不得不同那位報喜報的先生一樣地失望。結果是，我請了一桌酒，送了兩位廩保一家十塊錢。在他們是大失所望，然而在我則已經筋疲力盡了。

終場以後，送過學差，請過客，我就從州裏雇船回學堂去了。說來也很奇怪，我們學堂八個同學去考（有鳳陽的，有壽州的，有鳳台的，有懷

遠的)一共八個人,結果進了七個,那一個進了一半,算是僉生。我們的總教習李筱園先生聽說我們來了,他特別地穿好官服,在那兒等候我們給他行禮。他那副忠厚而負責的面孔,充滿着愉悅的顏色,意思是說道,我總不辜負你們皖北的士子罷!

由上述的事實看來,就可知道那時的我,一隻腳雖然插進了『洋八股』的學堂,另一隻腳却仍然在玩『舊八股』的老把戲。這並不是個人的行動自相衝突,而是時代的矛盾!然而科學畢竟是被學校,舊八股畢竟被『洋八股』所代替了。

三

(31)
滿洲政府既內迫於革新黨人和民衆的要求,外迫於國勢的危弱,

在政治上不得不以預備立憲來支撐門面，對於興學育材，富國強兵也，不得不表示積極。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北洋水師學堂，保定軍官學堂；南京則設有兩江師範學堂（又名三江師範）做爲培植蘇浙皖三省師資的地方；又設了一個將弁學堂，一個陸師學堂和一個水師學堂，都是培植海陸軍中下級幹部人材的機關。當時的青年（包括着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中小資產階級的青年）都被這內憂外患的政變的浪潮掀動了；他們在鄉村中不安起來了；他們在私塾裏造起反來了；他們的下意識已經觸到帝國主義伸入內地的毒鬚，開始感覺到自己個人的空虛和社會的空悶了。一旦聽說南京開了學堂，只要稍微有點勇氣的，都成羣結隊的跑了出去。從十幾歲的兒童到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私塾的先生也有，學生也有，秀才也有，廩生貢生，舉人老爺都有。所以我們

小時，一聽他們談起南京，那就恨不得有齊天大聖一筋斗十萬八千里
的本領，一筋斗翻到北極閣，心裏已經在做『長安』夢了，加之年暑假
看見一些『和尚頭』的學生，穿着操衣回來，真是羨慕煞了；那時的小
心靈被牠激得怦怦地在動了。我之決心到鳳陽經世中學，一半是受了
這種環境的鼓勵。

上述的南京的各學堂，是辛亥革命的（至少是長江下游革命的）
策源地；後來民國許多「新偉人」（川）大半是從那裏投胎出世的。
同時我們研究辛亥以前革命運動，也不得不特別注意安徽在革命史
上的地位。安徽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在軍事上，政治上都表示牠的重要。
在皖北則有張洛行，苗沛霖等的反叛，在徽州，甯國，桐城則為湖北，江西
的兵事上所必爭之地；在安慶則上可以策應湖口水師，下可以策應蕪

湖，浦口，廬州，及江南大營的軍事，所以曾國藩把他的兄弟曾國華曾貞幹都位置在皖中，而以安慶爲樞紐。至於辛亥革命一役，淮上軍崛起壽州，鳳台，懷遠等處，與安慶獨立，均足以壯革命軍的聲勢；因爲前者與武漢以應援，而後者則直接影響於南京的克服，並做牠的江淮屏障。但要研究安徽革命的史料，又不得不溯源於以下六個組織：

(一) 安慶高等學堂。這個學校是當時全省的激進分子的大本營，陳獨秀氏即是其中之一。他在高等學校宣傳革命，鼓動學生組織種族革命的團體，又在藏書樓講演並印行革命的小冊子，事爲當道所知，下令查拿，陳氏遠遁，學生之激進者，亦受一打擊，然而革命思想的種子亦種於人心了。

(二) 『練軍營』。這是安徽新軍的母親。當時主其事的是個海

軍人材姓譚的，此人很幹練明敏，對於初萌芽的革命思想，也與以相當的同情，還有一個教練官（當時確實名稱我記不得了，也許那時叫做管帶）顧忠琛，是完全與革命的學生通聲氣的。當時的練軍學生以皖北的青年爲最多，而皖北各縣，尤以壽州，鳳台，懷遠爲最多，而大多數急進分子及領導人物則又多出於壽州鳳台兩地的人士，柏烈武（文蔚）畢少山，張孟介，袁子金，廖少齋等等皆投其中，而以柏烈武爲中心，後來江淮革命軍的領袖人物都發祥於此。

（三）蕪湖的安徽公學。這個公學之建立，稍後於南京之陸師學堂，將弁學堂與兩江師範，安慶之高等學堂。主其事者爲桐城名士李德高（字光炯）與無爲盧仲農。這個學校從湖南遷來的，而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氏。擔任教授職責的，皆爲當時革命思想及行動

的領袖人物，爲劉師培（字申叔）、陳獨秀（字仲甫）、趙伯先、柏文蔚、冷遜等，而安徽前教育廳長江暉（字彤侯）也都是這個學校的教員，皖南北青年子弟在這裏受了不少的革命宣傳與訓練（自然是種族革命的）。

（四）同時，陳獨秀氏又在蕪創辦安徽白話報，批評時政，發揚民氣，遠則與南京，安慶的革命團體相呼應，近則與安徽公學相表裏，影響很大。這裏已經伏下陳氏後來文學革命的胚胎，於此而論，陳獨秀胡適兩人文學革命的努力，不能不有先後的軒輊了。

（五）再者，我們對於安徽一省的革命的史的研究，更不能不追溯一個人。這個人雖然在袁氏稱帝時代，做了似乎遺臭萬年的罪惡，然而對於辛亥革命，却是盡了很大的作用，這不僅就他後來在東京幫助

孫中山氏組織中華革命黨，組織同盟會而言，就是照他在家鄉對於教育的努力，也是值得我們在這裏敘述一下的。這個人就是壽州孫毓筠氏。孫毓筠字少侯，是孫家鼐相國的胞姪孫。他自然是刮刮叫的貴公子。他的天資非常聰穎，且極好學，而性情又極豪俠，當時所以有『信陵平原』的稱呼。他本人已捐了候補道員，家產大約有二十萬，所謂既富且貴，又有學識。他因受了甲午之役與戊戌變政之影響，在壽州城內創辦公學，招收城鄉子弟，施以教育，並自任管教之責。學生有病，親身爲之看護，城鄉青年莫不大爲感動，相率來歸。又擇其中年長而有志趣者，資送他們留學日本，於是社會之間，陡然表現一種活潑潑的氣象。風聲所播，遠近皆來觀光，青年的種族思想，也蓬勃地發揚滋長，久而久之，外邊便有點『談虎色變』的樣子了，地方官吏也都有慄慄畏懼的心思，徒以

他是貴公子，不好加以干涉。後來因爲鬧得太厲害了，連孫家一族的官僚貴族都恐怕鬧出亂子，連累他們，又因省中撫院藩司都有所聞，知州怕擔負不起這個擔子，才把壽州公學解散，孫毓筠氏也就把家產變賣，跑到日本去了。然而這些學生後來大都做了淮上革命軍的偉人。

我雖沒有進過壽州公學，也沒有進過練軍營，更沒有做過安慶高等學堂的學生，沒有受過兩江師範，將弁，陸師的教育，只因我的家鄉距壽州城只得六十里，在那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在傳說中受到壽州公學的神話式的影響，而壽鳳兩縣的兩江，將弁，陸師，安慶高等，練軍營等等的學生中，家鄉的親友也不少，這無形中，自然給我莫大的鼓勵，我又是一個破落的中產階級的兒童，當時因爲廢了科舉沒有出路，自然也就要望學堂裏跑了。

說到我是個破落的中產階級的兒童，就不能不說一說我的家庭的社會關係與經濟地位。我家在明末清初本是一個大地主，據家譜所載，明末大饑，我的祖先曾經捐納過三千擔糧食放賑，朝廷御賜「尙義門」的匾額來褒獎，自我們的祖先直到我的祖若父都還以此自誇，觀我們祠堂的對聯：「先人助麥三千石，聖祖頒恩尙義門」可知。到了我的曾祖父時代，家中還是鼎盛之秋，一方面擁有上千畝的田地，一面又是大鹽商，大行商。我的祖父弟兄八人，大都因習於安逸，不理家務，不治生產，家道漸漸中落了。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不用再敘。到了我出世以後，我家雖然還是小康，然而其他各房都窮了，甚至窮得不堪。祖父死後，父親接着管家，他一共兄弟四人，他是老大，所有一家十餘口的衣食都得他擔負。他本是一個極忠厚老實人，三個弟弟一齊聯起盟來對付他一

個，雖以我的母親那樣精敏強幹，有條有理的人幫助他，依然是無濟於事，結果是塌台了。從前祖父遺留下來一個稅關的職務，現在也停歇了。家中幾乎斷炊，典當借債已經不中用，而家中的吵鬧却是十分厲害，雖然在形式上分了家，却日夜不讓你安，不是今天要罵，就是明天要打，並且聲言要來查抄我們的家屋，說是我父親落了許多私房錢。

這時候，我已十七歲，到鳳陽經世中學堂讀書了。那年冬天回來考試，到了家鄉却認不得我的家在何處，後來到了親戚家，才曉得我的幾個叔叔要來查抄房屋，鄰舍和親眷看不過去，代我們在外邊租三間房屋，一間廚房，在夜間，大家相幫，偷偷地給我們搬出去了。我的母親是一個意志極堅強的人，又得我外祖一種嚴格的家庭教育，所以她雖然處在這種極困難的境遇，還是極有興趣地向前掙扎，一點也不頹唐。曾記

得我第一次回來過考時，她要督我完婚，我說，一完婚，我的學業就要受影響，今年考試，不過進場去看看，真正去考，還待明年。這末一來，明年考試，定無希望，母親很以為然，果然，下年我就進了學。但是在我本人，當時雖然也不免有點（極短促的時間）得意，然而一到學校，這種觀點便消滅乾淨了。我們的中學堂原來是書院改的，其中的教員也大半都還未脫去書院山長的習慣，不過牠究竟是學堂了，除了功課之外，准許我們讀書閱報，康梁的文章以及與之有關係的其他著作，也都有了接觸的機會。至於教習當中最值得我紀念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南京李籟（筱園）先生。他本是我祖父的朋友，他的大兒子，又是我父親的把兄弟。他待我極厚，教我極勤，而其教法在當時算是極合法了，我的國文的根基和作人的門徑都是從他那裏得來的。他是一個經學家，對於詩經有許

多的著作。另一個是歷史教習武竹坪先生，他的爲人非常拘謹，見人沒有多話說，相貌長得非常醜，高顴骨，窪眼睛，兩條長而濃的眉毛，橫在上面，鼓着嘴唇，我們常在鳳陽城外皇覺寺看見明太祖朱元璋的書像和他的相貌相像，我們私下裏都喊他做朱太祖。他在行動上雖然沒有朱太祖那樣的偉略，打倒了蒙古人的政權，征服諸將，統一中國，但在思想上他那冰山似的冷面孔裏面，却燃燒着排滿的革命的火焰，他講中國的歷史講義，都是自己編的，雖說是以夏曾佑氏的中國歷史講義(?)爲藍本，卻參考了許多富於排滿的種族革命的歷史典籍，如當時的國粹學報，明末各種野史，以及康梁的文字。他的每一次講授，我們都細心地聽，沒有一個缺課的；而且他在講授之前，每次都提出許多歷史上的問題，教我們筆答，我們得了這個機會，便放言高論，不管三七二十一，我

們總要把問題拉扯到種族問題上，說一些革命的大話，他也好，總是給我們些好批評，鼓勵我們。直到爾今，差不多三十年了，經世中學的百十個同學和十幾個職員的姓名相貌完全都從我的記憶中消逝了，只有李筱園先生的敦厚篤實的容貌和武先生的包含着真誠與熱情的醜怪面孔，還時時浮泛在我的腦海中，引起我的回憶，唉！差不多三十年了！

四

我進經世學堂，說起來，也十分艱難。論理我沒有進去的可能，因為那時考取學生的國文標準很高，我的國文程度實在淺得很，連三百字的清順的文字，都謫不出來。我投考這個學堂，完全是受了牠的總教習李筱園先生的鼓勵也終於藉着他的提攜的力量，取了一個備取。備取

是不能馬上進學堂的，要待正式考取的學生有缺額，才能遞補進取。未進學堂之先，即住在李筱園先生家；他照常教我讀通鑑，讀國文，做日記，寫文章，我也急得沒有辦法，只好拚命讀書，他雖在百忙中，對於我的教導，絲毫不懈怠。甚至吃飯的時候，還給我講解做文的法子。不久，我即補入正式生，進了學堂。但是我的國文還是不成。經世學堂的章程，學生每星期日要由國文教習出題做文一篇，文字好醜，列爲等第，於下星期榜示出來以示鼓勵。初進學堂的時候，我的名字老是『坐紅椅子』。所謂『坐紅椅子』就是名列倒數第一。受了這種刺激，更不能不發奮讀書。書牀面前放了一張小桌子，上面一盞洋油燈；我每天是合衣而臥，醒了就把選的文章，拿過來讀，不到一年，我的名字在每次的榜示上，居然從倒數第一名跑到了前三名，這自然使那些年紀比我大，資格比我老，學

問比我好的同學們不服氣，使他們望着我眼紅。可巧又有一樁意外的事情湊了來，遂使我和我的幾個拜把子弟的好同學都弄得板起面孔，不歡而散。

我和一個姓嚴名福林的同學，在全校的英文班中，常常得到一百分。英文教員陳廷枏，懷寧人，年紀很輕，却很老成，英文在那時也還可以。因為我和嚴福林的英文好一點，他也就特別和我們親近。第二年招考新生，學堂不願多請教習，陳先生又忙不過來，於是他就提議：把我和嚴三升為英文助教，分任新班英文教員，酌給薪水，學堂當局沒有異議，事情照辦，而平地一聲，就起了一場大風潮。因為新班同學也和老班同學一樣，大都是各縣來的秀才或老童，年紀大的有三十多歲，小的也有二十多歲，比我和嚴三大都是「十年以長」「五年以長」。他們看我們

兩個十八九歲的青年，怎樣肯從我們手裏討教？況且老班同學又有許多人在吃醋，未免對他們加些麻油醬油，『因風吹火，』結果，我們兩個助教上堂，他們罷課。同學的既然不承認我倆當助教，又因我和李筱園先生的關係，遷怒於李先生。學堂裏馬上就分成擁李，反李兩派，這時學堂的監督章先生，他是全椒的老進士，和李先生有意見，似乎也樂於在旁觀看我們兩方的鬥爭，『站在高樓看馬踢，』沒有積極地設法解決。我們年紀輕的人，自然也不耐煩了，可巧嚴幾道到安慶任高等學堂監督，我們慕他的名，遂向學堂當局呈請咨送赴省，投考高等學堂，學堂的督辦是鳳陽道，就由道台咨送安徽提學使，於是我們兩個就捲捲行李走了，這場風波也就因此收場。

當我初進學校時，很有許多同學都和我要好，大家並且熱得不開

交，青年人是受熱情所支配的，他們不曉得世故，沒有經驗，大家一見如故，性情相投，使你兄我弟地拜起『兄弟』來。當中最和我要好的是壽縣的鄒佩五，鳳台的王棟臣，懷遠的殷厲奎，殷聚五兄弟，鳳陽的章明軒，章吉燾，明光的黎祝溪。殷厲奎年紀最輕，又聰明，又漂亮，比較地多受了點家庭教育，因為他們是懷遠的世家，舉動在我們那時的眼光看來，是比別人大方的，所以我們兩個最要好。曾記得那年冬天，我們同伴從臨淮坐船回家，我們兩個睡在艙中，頭並頭地摟在一塊，簡直同初戀的愛人一樣。但是後來起風潮，罷課，反對我的領袖，就是他和他的老兄以及黎祝溪等。這件事給我一個重大的打擊，也可說是一個極可寶貴的教訓。我那時便覺悟到社會的人與人的相處，光靠一時的感情來維持是不夠的，光靠一紙的『蘭譜』更是靠不住，所以我臨動身到安慶投考

高等學堂之前，把我和他們交換的蘭譜，總有幾十帖，一場刮子付之一炬了！自此以後，我死也不肯和人拜弟兄。

可是這些把弟兄當中，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也還能保持很友誼的態度。始終能了解我的，要算是鄒佩五。老鄒是個小小的箇兒，臉上幾點麻子，圓面孔，重眉毛，却非常愛漂亮，彈得一手好琵琶，好月琴。他比我大三歲，確實比我懂得些世情。那時章吉燾的家，是我們的俱樂部；他住在縣城，房子非常宏敞，後面靠着城牆，三面環以溝渠，左右有橋，橋下流水曲曲地從城腳下的陰溝中流出，門前垂柳掩映着，樹下一排石凳，夏天晚間大家坐在那兒納涼，再好沒有。我和老鄒每逢星期就到老章家裏吃飯，他的父親本是縣裏一個書吏，人極好客，家中的飯菜又極其考究，所以大家皆樂於到那裏去。還有一層使老章不能不歡迎我們的，就

是我是老章的經常的「槍手」。老章那時已經三十歲了，老婆孩子都有了，平常又愛舒服，不肯用心，家裏橫豎有的是「衣食住」，所以學堂裏一應課文及日記等等執筆，都是老鄒和我，尤其是我替他效勞；他每星期六，一到下午便笑嘻嘻地把循環日記簿交把我們，並且叮嚀囑咐地約我們明天到他家裏去，我們自然是雙手贊成的。我們拚着一夜工夫，把他的日記敷衍完卷，例課的文字，也是我替他操刀。星期日，早飯一吃，我和老鄒便一溜烟地跑到縣城裏去了。到了他家，談笑，彈琵琶，唱小調，吃酒，猜拳，鬧得「不亦樂乎」。有時，老鄒把他的眉毛一皺，把琵琶一放，偷偷地出一口氣，好像有什麼不可解的憂愁似的，問他，他不說；問急了，他拍着我的肩頭說道：「兄弟，對你說，你也不懂。」我逼着問他，究竟什麼問題，他又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你曉得我為什麼到這兒來進

學堂？我果真是來進學堂麼？」我說，「你是來進學堂，真的來進學堂，這還有什麼假呢？」「是的，我真的來進學堂，但你曉得我要到此地來進學堂的原因麼？」那天他着實多乾了兩杯，他於是就滔滔不斷地說出了他進學堂的原因了：

老鄒的父親名叫鄒少衢，也是壽州城內一個小名士，在軍營中做了一輩子的幕友，所以兒子們都多少會諳幾句文章。他的大兒子那時還在張統領那兒做文案，他的家裏自然沾染了官家的習氣。老鄒弟兄五人，他是排行老四，出世不久，就跟着奶媽睡，後來直到了十一二歲，還是跟着娘姨睡。那時帶他睡覺的娘姨，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鄉下娘子，白白的臉兒，圓圓的面孔，一身打扮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夜間睡的時候，娘姨總是摟着他，有時候被窩裏睡暖了，不知不覺地就要動手動腳，

忽然一手觸到她的胸前的兩個高聳的地方，軟勃勃地異常適手，於是他的手就輕輕地揉搓幾下，覺得很適意；娘姨並不覺得只是眼眯眯地讓他去摸。他看見她不生氣，漸漸有點勇氣了，於是就從暗中向下摸索，又覺得觸到一種異樣的東西，……他嚇怕起來，想叫喚，又不敢，想問娘姨，又恐怕她發氣，正在躊躇，只覺得娘姨摟着他，……

……他倒覺得怪有趣似的。於是每夜如此，娘姨和他便成了一雙情侶了！老鄒至此便已嘗到人生的滋味，我雖然那時已娶了老婆，但是聽他談到這些故事，只是睜着眼睛，張着大嘴，呆呆地望着他，望得出神。老鄒忽然拍我一下道：『老弟！你聽得快活麼？』我說：『這與你進學堂有什麼相干？』『你慢慢地聽，不要慌。』

他的那個愛人的娘姨，因事被家長辭退，他也漸漸大了，便自己獨睡。但是，他不知怎的，總是睡不着，翻來覆去，唉聲歎氣，白天也是忽忽不樂，彷彿就像喪魂失魂的樣子，一天消瘦似一天。他的父親一天吸到夜的鴉片煙，不問他們的事，母親因為人口多了，也不能時常照顧他們小弟兄。但是他的情形越弄越壞，終日地鎖着眉頭，飯也不想吃，也沒有言語，見人總是低着頭。家中人都背後在議論，有的說，四少爺莫非是中了邪氣，也該告訴老太太，叫人請點錢紙，燒柱香，替他叫叫魂；有的說，這是癆病胎子，應該請醫生吃兩帖藥。他們見了他來，便把話頭馬上停止，多少隻眼睜望着他，鬚鬚是在替他擔憂，從他們的神情中，可以歸納出一句結論，就是：「我看你怎了！四少爺！」他知道他們是在談論他，便一聲不響，訕訕地又跑到自己屋裏躺在床上，面朝着裏邊流淚。久而久之，大

家把話傳到老太太耳躲裏去了，老太太便請了一位醫生給他看脈，醫生說，脾氣太重，血分又虧，吃幾帖健脾補血的藥便可好了。

這時他的姑母攜着他的表姊從懷遠來，家中未免更加忙碌，沒有工夫顧到他；雖說有個老娘姨專門伺候他，在他看來，簡直是「肝不壓肺」，不關痛癢。但是吃了醫生幾帖藥，果然好了，你道果然是醫藥的力量麼？哈哈，不然，不然。他的姑母因為他的姑夫死了，只剩下她和一個十六歲的女兒，對內對外，都得靠人照應，所以把家搬到他家來，和他們同居。他家特把旁邊一徑房屋，三間一厨，分給她們住。他的房屋的小門一開，就可到他的姑媽屋裏去。初來的幾天，彼此面生，又加上他自己有心事，大家見面不過打個問訊，依然是陌生的。然而他看見他的表姊，差不多也和他一樣地不說話，一樣地孤寂，一樣地帶着憂鬱的面容，他想

去問她，是不是也同他害的一樣毛病，但自己一想，自己連自己的毛病都不曉得，怎好問人，而且姑媽在跟前，更不敢冒昧，但自己總覺得他的心情起了另一種的變化。現在自己不想別的，只想怎樣使他的表姊不要那樣憂愁，要快活，要把她那白淨而又嚴肅的臉兒，變成一個笑嘻嘻的面孔；要使她有講有笑；要使她和他在一塊兒起坐；要使她得到安慰，但是不知道從何下手。他的姑媽看出了他的心事，搬着他的頭，翻過臉來，吻着他的小嘴道：「乖乖，你爲什麼不說話？你和你表姊在一塊去玩呀！」回頭望着他的女兒道：「咦！蘭若，你比他大些，爲什麼也這樣不大方？我看你表姊弟兩個到……」又吻了他一下道：「四兒，你不要怕，去和你姊姊玩去。」這時他的勇氣來了，上前去拉着他的表姊的手，但是——時又不知說什麼話好。蘭若任他拉着手，卻是低着頭，一言不發，有時偷

偷地抬起頭來看他一眼，馬上又把臉沉下去。他躊躇了好久，終於說了一句話：「到我屋裏玩去，好罷？」他們到了他的屋子，兩個人都覺得輕鬆多了。他問她：「姊姊你多大？」「十六。」「你呢？」「十四。」蘭若把他的屋子看了一遍，忽然看到一個東西，掛在牆上，很奇異地道：「那是什麼？」他的幾個哥哥都喜歡中國的音樂，他自然也是懂得的，隨口答道：「琵琶。」蘭若道：「做什麼用的？」「彈着好聽。」「你會彈麼？」這末一問，到把他難住了：待說會，假使教我彈，怎麼辦呢？待說不會，假使她喜歡，那不是令她不快活？倒不如反問一句：「你喜歡聽麼？」蘭若說：「我喜歡聽。」「那麼，我就會彈。」蘭若把臉一紅，登時轉過頭去，過了半天，才慢慢地說道：「你彈彈看。」他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喜的是，她沒有生氣；驚的是，他實在不會彈。雖然也時常聽他幾個老兄彈得好聽，雖然也知道

工尺和手法，然而卻未曾實地動過手。到了現在，卻「逼上梁山」，「騎虎難下」，只得把琵琶拿下，抱在懷裏，輕輕地撥了幾下，自然是不好，然而在蘭若聽見了，已經是一空谷足音，「她覺得她自己的牢牢關閉在深淵的，久已成了槁木死灰的心情，被他這幾聲琵琶打開了，挑動了；她又從嚴冬的苦寒的空氣中解放出來，重新得着春天的陽光。他看她低頭不語，以為她是在不高興，上前去安慰她，對她道歉，說他實在彈的不好，要她原諒。蘭若把頭一抬，兩人的眼光恰好成了一個直線，從這一道直線裏，她的心事，電也似地，傳到他的心靈裏，意思就是說，我要你天天這樣彈。我要你天天這樣彈給我聽；我願把我的生命托付在你這琵琶的哀音裏。他們兩人就這樣地定了他們的心情；他從此真的天天彈起琵琶來，只要他一彈琵琶，她的身心就跟着他來；只要她一來，他也就馬

上把琵琶彈起。有一天彈到高興的時候，忘了形，把琵琶一放，摟着蘭若道，我的姊妹，我彈得好麼？蘭若並不掙扎，只是讓他緊緊地抱着，兩人眼裏都不知不覺地流下淚來。蘭若支不住了，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忽然聽得窗外一聲，「蘭兒！你們在這兒好玩，爲什麼不彈了？」話還未落音，他的姑媽走進來了，一看這種神情，大吃一驚，但她同時又想道，她的女兒若果能配上這個青年，也到是一件稱心的事，但願得他們兩小無猜，馬上變了很和平祥慈的態度，笑殷殷地道，你們好好地彈，不要太勞神了，沒事也好讀讀書，從此她反越發鼓勵蘭若和他親近。時光過的快，忽忽已是四年了，蘭若這年二十歲，在理，應當早點和人攀親，只以她的母親意有所待，不願提起這事，而在老鄒自己，也自以爲他的父母是不會反對他們的志願的。他們近來越發親近了，連一點形迹也不拘了。那曉得，

「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他們的事情，被老鄒的父親曉得了，把他的母親大罵一頓，說她太無家教，弄得家風敗壞，講了一大篇道理，並且決定馬上給他定婚，一面把蘭若的母子遷出去住，不許他和她親近。在舊式的家庭中，他自然沒有積極地自由主張的權利。蘭若那天在他的房門口上轎，他自己却在房間裏流淚，想出去和她說幾句話，但他沒有這種勇氣，終於眼睜睜地望着蘭若她那灰白色的面孔，一剎那間，轎子一閃，便在慘淡的陽光中消逝了……」

說到這裏，老鄒忽然又提起嗓子說道：我到了這時，已視家庭如毒蛇猛獸，不能再繼續地住下去，一定要馬上離開牠才可以回復我的生命的光輝，這就是我到外邊來進學堂的一個主要的原因。他這種戀愛的悲劇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這是第一次，也只有我和老章兩人曉得，

然而我初次聽來，實在是聞所未聞，雖然不十分了解，然而老鄒的憂鬱寡言的神態，我却找到了解釋了，胸中非常快活。老鄒和我也從此更加親近，一直到他離開經世學堂，我們中間的交情，還是始終一樣。他這人雖然經過了這種打擊，而他那一股好勝愛強的性情，還是十分厲害。他文字不如人，便拚命地學文字，英文算學不如人，便拚命地學習英算。他不肯受人的批評，不但同學的指摘，他不願聽，就是教習的刪改，他也大都不服氣。每逢教習對他的文章有一點貶詞，他便把麻臉一紅，用力咬他的嘴唇，一聲不響。因此他就同漢文總教習李筱園先生鬧起意見。李老先生是以從前書院式的舊方式來對待「洋學堂」的學生；「他教學堂的齋夫們稱他做老爺，稱我們學生做少爺，諸如此等的事很多，自然不能相容，而他那老而彌篤的熱情和他那孳孳求學，誨人不倦的責任

心，也就因此都埋葬在那舊式的處世對人的方法中了。老鄒和他衝突，第二年下學期就到南京去進了將弁學堂，我也離開鳳陽，以後我們就沒有見面，他快畢業時，病死在學校。而今三十年了，他那麻臉彷彿還湧現於我的眼前；他那全指揉彈的琵琶聲音還時時隱約在我的耳邊！

五

我們到安慶去投考高等學堂的，先有三人：嚴福林，他的二哥燕林和我。臨行時鳳陽道給我們一封咨送的公文，把我們在學校的成績及分數都詳細說明，並把我們誇獎了一頓，每人又送了十幾塊錢川資。嚴燕林本與這次風潮不相干，不過因為他的弟弟的關係，他也願意同陣到高等學堂去投考。那時津浦南段還未動工（或正在動工？）我們就

僱了三個騾剝子。怎樣叫做騾剝子呢？當時從鳳陽，經臨淮，明光，滁州到浦口，是溝通江淮的一條官道。客人有錢的，多僱轎子；次一點的，便僱騾子。騾子背上既載客人的行李箱籠，又可坐人，一舉兩得，在當時是很經濟的辦法。沿途各站，都有騾馬店，旅客憩店或打尖，飯菜由客人自己去買，或由店家代做，或由趕牲口的代做，走時，出幾個房火錢。當時的騾馬店，要以我們過慣了現在的生活的身子去住，那真是「馬棚」，現在大都市中頂癩脚的小客棧，也比那強十百倍，然而在當時，我們却很覺得滿足。一天風吹日晒，顛簸盪動，勞頓得要命，到了晚上，一住店子，兩三碗飯或是兩碗麵條下肚，倒頭便睡，呼呼地一覺睡到天亮，毫無所苦。從鳳陽到浦口是三百六十里的路程，我們早晚趕一點，五天到了浦口。天色晚了，不能過江，就住在一家極有名的萬載老號的騾馬店裏。到了江南，

畢竟與皖北不同，房間也比較乾淨起來了，火食也比較可口起來了，我們好好地暱了一夜，大家都滿懷着無窮的熱望，早早渡江。第二天一早我就起來了，嚴二胖子（這是我們給嚴燕林起的一個綽號）還在那兒打呼，我們把他喊起來，他還發脾氣，鼓着嘴道：「你（鳳陽的土語）即「做什麼」的意思！今天不能過江，不如讓我多睡一時。」我和福林聽見了，大不以為然，以為是他騙人，齊聲說道：「不行，無論如何，今天非過江不行；在這個地方呆着，急也急煞了！」嚴二胖子板着臉道：「急又什麼用？你聽聽風看。今天這大風，一定封關，江是過不去定了，讓我暱罷！」我們一再同他商量，問他有什麼法子，他說：「法子到有，要得你們依我的話才行。」我們說：「依你怎樣？」他說：「你們都給我披掛起來，不是，不是，裝扮起來。」又不唱戲，為什麼裝扮起來？」我們叫道：

「誰同你開玩笑，你聽我說：過江不是玩的，必得風平浪靜，若是風大浪起，小船固然是送死，大船也是危險。所以每遇有風，江口義渡局（或救生局）便掛旗封關，禁止民船渡江；若果真有緊急的公事，則由救生局派差船專送。這個差船是很大的，在江裏禁得起風浪，船上的人手又多，大致是可以平安渡過的。」我們急着說：「你不是開玩笑？我們又不是有什麼緊急的公事，那裏去找到救生局的渡船？裝扮起來做什麼？而且怎樣裝扮呢？」這到不然，他說：「現在不是洋學堂吃香嗎？洋學生雖然不是官兒，但他的威風至少也要抵得候補道。我們大家把操衣一齊穿起來，穿上靴子，戴上學堂的帽子，拿着名片，到救生局去拜會他們的同事的人，就說，我們到兩江師範有緊要公事，急須過江，請他們派差船專送，大概可以行得，不信，去試試看。」我們沒法可想，也只得依他。吃

過早飯，開消了騾剝子和客店錢，大家真的穿起來了。我們的操衣是黑嗶嘰的，大致像從前撫道的「戈什哈」穿的制服差不多，袖口，下擺和前後都鑲了本色的「雲字」，鍍金釦子，黃亮亮的；脚下穿着改良的圓頭快靴，頭上戴着學生帽。三個人後頭跟着行李挑子，大搖大擺地到了救生局，我們自然是推舉嚴二胖子做發言人的；片子拿進去，不多一回，果然聽見裏面一聲「請」，屏門開了，我們到了廳屋，嚴二胖子官腔官調地同那個小老爺如法焙製，打了幾句官話，那位小老爺果然答應立刻派船送我們過江。我們上了船，不要大半個鐘頭，便到了下關。到這時，我才曉得洋學堂，洋學生的聲價，而嚴二胖子對我們兩個更表示他的勝利的光榮了！我們也着實稱贊他的神機妙算。

到了南京，我們只住了一天，第二天就搭上水船上安慶，第一天上

午十二點鐘到蕪湖，第二天，天快亮的時候到安慶。從夜色濛昧中，只遠遠地看見高聳而孤立的一個東西，同船的人告訴我們，說是「迎江寺」的寶塔。「城外星星燈火與江水相映，並隱約間看見城牆垛子，才知道牠就逼近江邊。到了輪船快停輪的時候，看見兩個大划子，上面黑魘魘的人，前後左右有好幾個搖櫓使槳的，從上水飛也似地奔了來，同船的告訴我，那是來上船的。這時我才明白，船到安慶，除了招商有躉船外，其餘的都不能直接上岸。那兩隻划子，靠近輪船，並不等牠停輪，便馬上貼在船邊，「哇」的一聲，許多的人都從半空中攀援而上，一片聲喊「大房棧，」「福來棧，」「新大房，」「長安棧，」「高陞棧，」「紅帖子四處兜了來；他們爭先恐後地獵取客人，彷彿是全綫攻擊差不多，把我們弄得頭昏眼花，無所適從；看看從大輪上望下降，簡直和從城牆上望下降。

是一樣的危險，更是欲行不得，到底嚴二胖子比我們勇敢，把臉一板，厲聲叱那些接江的道：

『通統給我走開，我們用不着你們！』

回頭對我們說：

『老三！你和宇涵兩個人在這裏看着，讓我先下去；你倆一個把東西朝下送，一個看好了，這時候要小心，防着行李被扒手扒去了！』

他就捲起袖子，從人身上，爬到船邊，攀着輪船的欄杆溜下去了。他在划子上喊我們遞行李，我們是一動不能動，人們在我們面前築成一道牆。在這時，我們真是『咫尺天涯』，沒奈何，我和老三商量，還是找一個棧房接江的，把行李交給他，免得我們笨手笨腳，一個不小心，滑了手或是

踏空了脚，翻到江裏去，那才是因小失大。老三同意，我們倆就硬做主張，接了高陞棧接江的帖子，把行李逐件交給他，讓他們搬，這我們才算鬆了一口氣。這些接江的真是神通廣大，他們上下輪船，簡直猴子似地，忽上忽下，或從人叢中鑽出去，或從人身上擠過來，任你如何擁擠的地方，他們都能打得進，不但是空身子行動，並且是扛着重大的箱籠行李。但是他們這種本領並不是天生來的，而是生活與環境把他們訓練成這樣的身手，也可以生產方式或經濟生活形式形成他們這種冒險的胆力與技能。譬如徽州一帶的山嶺重疊，那裏的農民經濟，大半出自山上的茶樹；一般的婦女們爲的要採茶，就要得天天登山，雖然是『三寸金蓮』也健步若飛，如履平地，這在大陸的人看來，真是仙人，實則也是生活與環境使她們不得不然。安慶接江的，有一點最討厭，就是他們爲着

爭着接客而互相謾罵；接着的是得意洋洋，接不着的便發出許多村話。什麼「老子搗死你媽媽，」什麼「老子要你的命，」「老子不是好惹的，」七嘴八舌，你言我語，雖然是亂雜，但他們中間，却似乎得到一種和諧，就像他們罵人的話頭，都有一定的節奏，變成了歡迎客人登岸的音樂，直到登岸之後，走進了城，耳根才算稍微清淨！

安慶城南門有兩個，東靠江邊，登岸沒有幾步，便進了城。城是在山坡上，從城門到大街，前後要登數十階級。城中只有兩條大街：一條叫梓桐閣，一條叫倒爬獅子，是個鬧忙市場，其餘還有西門城內外一條街道，也還可以，但因為安慶本身不是一個工業區域，又不是一個大的商埠，而本地的經濟狀況，還滯留在手工業的生產社會裏，不但比不上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寧波，並且還趕不上南京、蕪湖。只因牠居於長江中樞，上

接武漢，下連滬寧，在政治軍事上都有牠的相當重要，所以安徽全省的政治中心，設在此處，也自有牠的歷史的意義。安慶的經濟狀況既然如上所述，所以人口並不怎樣繁盛，我們雖沒有統計調查，然若果憑我們的經驗，來分全城居民的職業和社會階層，大約百分之二十是商人；百分之三十是官和紳；百分之五十是『吃衙門飯的。』這種吃衙門飯的，包括下面幾種人：

(1) 差役；

(2) 書吏；

(3) 跟班的，又叫『捧大帽子的』(依前清的話來說)就是給候補老爺聽差的。

(66) 所以一般說來，這個城內，是包含着許多不可名狀的極污穢極卑鄙極

懦弱，極無恥，極無反抗性的因素，所以本地的居民在精神上，在知識上，是找不到他的什麼優越成分的。他們所耳濡目染的，無非是今天某人上任，某人加委，某人升官，某人調缺……一類的事實。

至於地方上的公共事務，或則說是權利，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完全操在幾個大地主，大紳士手裏，最顯然是教育。在安慶城裏最有勢力的紳士要算是一個姓H的，一個姓C的，一個姓F的，一個姓W的；他們都是科第出身，或是名宦出身，所有全城的教育機關都在他們手裏，如教育行政機關，如各省立學校，縣立學校等等，於是乎在這裏就發生問題。因為以一部分（即懷寧，桐城，太湖距省極近的幾縣的）紳士把持着全省的教育機關，就引起了兩種鬭爭：一種是平民社會的知識分子與大紳士的衝突；一種是距省寫遠，尤其是鳳，潁，六，霍等處的紳士及知

識分子與省中一部分士紳的衝突。這兩個衝突相錯起來，就形成數十年來皖南北人士的各種爭執。這其間自然也就夾雜着進步與保守兩派的爭鬪。譬如，嚴幾道辦安徽高等學堂的問題罷。

我們這次到省，爲的是要投考高等學堂；而我們所以要投考高等學堂，也正爲的是嚴幾道到安慶來的原故。所以我們一到安慶，第二天馬上就跑到高等學堂，投了公文。又去會那裏的同鄉學生，打探消息。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正在鬧風潮。事情是這樣的：——

盤據安慶省垣一切公共機關的是懷寧、桐城、太湖幾縣的大紳士，不是四代翰林的門第，便是三朝狀元的家聲，他們把地方的及全省的教育機關，通通抓在手裏，不讓其他人說話，更不讓其他各縣，尤其是皖北各縣人士說話，於是就形成省城中皖南北兩大系的對抗。皖北的紳

士當時以合肥的童茂仙，霍邱的竇以珏，六安的楊雲麟，合肥的吳性之諸人爲領袖，而舒城的黃書霖，李瀚章的兒子李健甫也與之通聲氣，並以兩江教育界及政界的前輩蒯光典（禮卿）爲精神的指導。在省城中的皖北紳士，既然想和皖南的（實則只是懷桐太湖幾縣的）紳士對抗，自然要拉攏皖北的各派的分子，（急進的和溫和的）結成一個聯合戰線。當時皖南大紳士在教育界的大本營，就是高等學堂。牠是全省的最高的學府，抓住了牠，就可壟斷全省一切教育行政權。皖北的紳士也看到這一點，事也碰巧，恩銘未到安徽巡撫任之先，大概先要問一問總督兩江的端方，老蒯和端方交情很厚，據說是把兄弟罷；他在江蘇雖是一個候補道，然而他的資格却與江蘇的撫藩臬抗衡，而與上峯之親密且比他們有過之無不及。所以他在兩江教育界也是第一把交椅。

(73)

恩撫既問道於端午橋，老端自然說，你去問禮卿好了。老恩那有不遵命的。當時的安慶高等學堂實在也不像樣，旅居南京的安徽教育界中人，都慫恿老蒯建議給恩撫，請他把改革安徽教育，首先就是改革高等學堂，和建立新軍，創辦陸軍學堂的事業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恩撫本來也很具有事業心，自然對於這種建議，極端贊成。不過顧慮到人材問題，蒯禮卿氏也曉得高等學堂是皖南大紳士在教育界的堡壘，沒有大聲望，大本領而又得巡撫十分欽重與信任的，絕不能當此重任，於是他就想到嚴復（幾道）論他的學問和聲光，在那個時候，當然是很適宜的。無論他在思想上，在行動上，就我們現在的眼光看，怎樣的不合理，然而和那時的皖南紳士的教育領袖比起來，那嚴先生自然是無可非議。恩撫着實是抱着「尊師重道」的誠意和態度，對於嚴氏的禮貌異常隆

重，第一請他擔任高等學堂監督職務；是由蒯禮卿氏以全皖教育界的代表而兼全皖青年的家長的資格，拿着恩撫的聘書去聘請的；第二，他到了安徽是由撫台前去拜他，尊稱之爲「嚴先生」而不名；若果在大庭廣衆之中，雖有藩臬提學各使司道在座，老恩也是把他放在賓師之位，藩臬等差不多都要執弟子禮；第三，關於高等學堂一切改革，完全由他自主，撫院不加干涉，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就常情論，應該可以有所展布；我們的嚴先生到了安徽也着實想做一番事業，一來是可以答復安徽青年（我就是其中之一）的期望之殷；二來也顯一顯他的經文偉畧，但是不幸得很，他接事不久，便被高等學堂一個風潮——他老先生捲出安慶城了。這一風潮在安徽的教育史上自然是一件恥辱，造成這種恥辱的原因，不問而知是皖南紳士的排擠，但所以使這種排擠的陰謀

得以「如願以償」的，還有以下幾件事實：

(一) 嚴氏本是一個學海軍的，他的教育方法，實在未免還有十足的「蠻氣」；而他到了學堂以後，深居簡處，不願和學生接近，致大多數青年無由得到他們的滿足，於是從前一番歡迎他的熱望，便馬上變成一種厭惡的心理。加之高等學堂的學生素來是散漫慣了的，他驟然一緊，已緊得有點受不住。何況他的辦法，着實來得厲害：所有的學生都得經他督率他信任的教職員嚴密地考試之後，重新分科；至於行將畢業的學生，也得經過嚴密的考試，始得畢業，不及格者，分別留級。這在高等學堂的學生們，簡直是個「晴天霹靂」，大家自然着起慌來了。

(二) 嚴氏不但考學生，並且要考教員。他並不說是辭教員，只是教員一個一個地分別請了來，和他談話，就各人所擔任的教課，發出許

多問題，請各人答覆。然後又問各人對於各該科的教授法怎樣。若果答得滿意，便下聘書。若是不滿意，便不下聘書。那就是無形辭退。有些教員頗有自知之明，不待嚴氏請他談話，便捲捲行李走了；有些自己還覺得『有個三爺頭的』，就去試一試。其中自然有一兩個頗使嚴氏滿意的，然而大多數是不夠六十分。這其間我們也當分別來看，實在有些也還可以，不過他們震於嚴氏在學術界的威名，一見嚴氏，不待談話，已經慌張起來，手足無措，不知所對了。最可憐的幾個所謂『東洋教習』，他們自然不肯見機而作，預先逃走，免得有損大國學者名譽；但是經過嚴氏一番過問，他們卻都得了『不及格』的評語，嚴氏當着他們的面，板着面孔，勸他們回到日本好好地重新研究幾年再來。我們就從那一次看穿了東洋先生的紙老虎，至少是看穿了那時在中國學校混飯吃。

的東洋先生的紙老虎。

(三)老嚴這末一來，自然把學堂中的舊教職員，差不多是肅清了，換了他的夾袋中一批新人物。這些人當中最得他的信任的，是一位周監學，聽說也是一個海軍學生。他對於學生非常嚴厲，上講堂教英語英文時，一句中國話不准說，誰說中國話，誰就馬上被罰。其餘的教員也都是嚴肅異常。這在極腐敗的教育腐化了的學堂中，平心而論，在那個時候，是一個必要的辦法，然而舒服慣了的先生們，怎樣又能吃得這種『如束濕薪』的苦頭？

(四)老嚴既然是受了恩撫的特殊禮貌，又挾着蒯光典等擁戴的勢力，自然以為可以放手做去，不稍顧忌，而他對於本省的司道甚至藩臬學使都不大理會，以為是我行我素。他見了撫台都是背着兩隻手，

戴着一副老大的墨晶眼鏡，大模大樣，老氣橫秋地侃侃而談；對於他人可想而知。恩撫自然是虛己以聽，沒有話說，但是藩臬學使以及府道自然是一人懷恨在心，不過是因為撫院關係，敢怒而不敢言罷了。皖南的大紳士們看破了他這種種弱點，首先鼓動裏面要畢業的學生，由他們先發動，而以反對周監學爲口實，他們的口號是「驅逐嚴蠻子！」「打倒周舅子！」風潮就這樣起來了。而無形之中，皖南的紳士和藩臬司道以及失意的教職員，恐懼失措的學生，結成了一條聯合戰線，而以懷桐的幾個大紳士爲中心，對老嚴做猛烈的進攻，全校罷起課來。自然有許多年青而有志趣的青年，不願意這樣做，然而在官僚紳士內外夾攻的成熟的空氣中，擁嚴的行動是表現不出來了。風潮一起，藩臬司道一齊上院請示，懷桐的大紳士遂藉口維持教育，出來說話，撫台也只是嘆氣，

找不到什麼辦法，不得已，打了個電報給老蒯；老蒯來了，起初還想挽回，住了一天，看看官紳各方面的空氣，才知道勢頭不對，也只得相當嘆息，聽嚴氏辭職而去。高等學堂的舊教職員和學生這次勝利了。老嚴還好，臨走時，談笑自若，一點沒有懊喪的神情，手裏拿着一本書，坐在轎子裏，在學生羣衆拍掌歡呼他們的光榮成功的聲中，走出了安徽高等學堂大門。現在有且先生復職的風說，若果他復職，自然一切都要恢復舊觀，高等學堂的前途和安徽全省教育的前途，可想而知。

我們聽了這番話頭，心裏也涼了半截。我們本是慕嚴幾道的名而來的，現在他既被人家趕走，我們也就沒心思再進高等學堂。這個時候的我們，正好像斷了縴的船一樣，不曉得怎樣是好。再回鳳陽去，經世學堂自然不會拒絕我們，然而我們是因爲不願意在那兒，才跑了出來，現

在又回去，少年人的好勝心，實在不許可我們這樣做。回到棧房後，大家商量，不得已去問計於我們從前的舊老師葉知府，我們在鳳陽經世學堂讀書時，他是那兒的知府。同時就是我們學堂的總辦。他這時，是督練公所的提調，兼辦陸軍測繪學堂。葉知府爲人很謙和，官僚氣還少，見了我們很歡喜，遂極力勸我們進他的測繪學堂，並說，中丞現在極力創辦新軍，測繪學堂，即是此項新軍之一種基礎的準備，你們都是少年有志之士，萬不可失此機會。我們沒法，也只得依他了。

督練公所就是我前說恩撫創辦新軍的一個中心組織；牠內中分三處：軍務處，參謀處與教練處。每處有一個總辦專司其事；其下各有提調若干人相助管理。那時軍務處總辦我記不清楚了；參謀處總辦是個姓陸費的，教練處總辦是宋芳賓。三處裏面除了幾個文案和葉知府三

數舊官僚外，其餘都是清一色的陸師，將弁和幾個日本士官學生。他們大都分任各科提調，論階級，都是中級軍官，那時他們的帽子上，都鑲着藍寶石，這就等於三四品的藍頂子。我們的同鄉如黎亞白，謝鳴文，盛之詹，汪國維等，都是其中的人物。——這是關於督練公所的组织。新軍則已漸次成立一個混成協；當時的混成協就是現在的混成旅。其中包括步兵兩標，砲兵，騎兵各一營，輜重，工程各一隊。協統于太燮是士官學生，標統一個是古作唐，一個是章和清，安徽含山人，後來黎亞白做了砲兵管帶（即今之營長），騎兵管帶也是個姓李的，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單說測繪學堂的事。測繪學堂初開辦的時候，即附設在督練公所裏面，學生不過二三十人；教員也只是由各科提調分別担任，規模很小，後來擴充到六七十人，便遷到文昌宮，而辦事的人都各有了專責。葉知府後來

也就調了別的差使。我們學校直屬於督練公所參謀處，當然以參謀處總辦爲總辦，實則主其事的，只是提調。遷入文昌宮以後的提調是牛雲峯（號企皋），監學是個姓江的（兼算學教習），其他教習有小劉（桐城人）、老彭（湖北人），他們大都是江南陸師將弁出身。老牛雖是北方人（直隸棗強縣人），辦事却非常圓通。老江是個聰明而好勝的人，他與我們極親密，這也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和嚴福林算學都有點基礎，他不得不對我們表示好意，加之他還沒完全脫離學生習氣，又和其他教習不大對，更不得和我們相與，藉做聲援。老彭是個酒鬼，每天必吃酒，每酒必醉，醉則必罵人，但他却是一個老實人。假使我要批評我們學堂的教職員的爲人，我還是要推他。大概說來，全學堂的教習對我個人都很看得起。

我和嚴福林性情不大同；他是個埋頭讀書，不大留心外邊的閒事的，我却除了功課之外，好讀別的書，好與同鄉中氣味相投的前輩來往。我們的學堂完全是照着陸軍學堂的規則，每星期要做一次清潔檢查與服裝檢查。記得有一次，禮拜六下午，學堂的提調，監學，週番官等全體出來檢查寢室，地形學教習張胖子檢查我的床肚子的抽屜，翻出一本太平天國野史（署名孫逸仙著）一本譚嗣同的仁學，張胖子很吃驚，對我望望，還好，他輕輕地道：「還不趕快收起來！」我和嚴二胖子也不同；我知道自己不行，不敢吹牛皮，事事虛心，同學的有什麼好書，我總要把他借來讀或摘抄下來。嚴二胖子他本來國文比我好，又已迫於生計，急於想找出路，然而我還是一個單純的學生，雖然我也曾受他的鼓勵，同伴去拜過某總辦的門，却是我永不會再走過他的門限。我的脾氣又

非常壞，好批評人家的好壞，又常自命不凡，卑視一切；這種結果，自然就免不了怨天尤人，變成消極，曾記得我有一首七律——病後偕同學孫君登迎江寺塔，兩膝酸痛，未及半而下有感，——固然不成詩，然而也可見我那時的性情了。現在我把牠寫在下面：

爲君此日強登樓，

湖海飄蓬動客愁，

萬馬濤聲悲逝水，

一江山色怕經秋。

人爭屈膝皆居頂，

我苦卑躬未上頭。

放眼白雲思故國，

孤舟野鶴自悠悠。

這完全是想追踪高人隱士；實則這一時期的心理，已經被官僚社會的空氣所籠罩，不自覺地，總免不了所謂洋入股，洋翰林的心理。那時，同學中和我最親近的是合肥朱篤之，盛寰中，因而就和他的老兄朱檢之及他的朋友吳性之先生相熟。朱檢之是學警察的，吳則是合肥的文人，平素以陽明學者自居。他們兩個都住高陞棧，我們每逢星期，一定要和朱老四（即篤之）到他們那兒去談天。吳先生喜歡吃雅片烟；他躺在烟床上同我談「良知合一」的哲學問題，又談太史公書，又談左傳，又談到象山二曲。凡於他所鄭重介紹的書籍，我都設法籌款把牠買來讀，讀了又去和他談，他非常獎勵我，我也就因他的獎勵而越發自己奮勉。有一次，安徽諮議局秘書長章宇澄氏在吳先生那兒因宋明理學問題，和

我爭論，章氏看我年紀很輕，以爲真理終在他，以之質於吳氏，吳則笑道：『宇澄你錯了，宇涵說得對，章氏遂悻悻而去。』章氏去後，性之先生問我，你會讀些什麼書，我很謙遜地答道：『我從前喜歡讀曾文正公的集子，和胡文忠全集，尤其喜歡讀曾氏家書和求闕齋日記，現在凡於先生平日在談話中所鄭重介紹的書，如遷史，班書，陽明全集，象山全集，我大致都畧畧讀了一遍，自己覺得還是很少了解。』性之先生把烟籤子望盤子上一放，欣然道：『好！』我說呢！不然你不會有這樣的談吐！那末，宇澄怎樣行！他不讀書，反在高視濶步，這種人是沒有長進的了。』我聽得又高興，又恐懼。高興的是，居然我也被人稱贊，並且被我所欽佩的人稱贊，這是多麼快活呀！恐懼的是，我的根基還是極其淺薄，知識和修養，自然還早得很，像章某，他在少年時代，或許也和我現在一樣，甚至比我還高。

明十倍也未可知。他現在不努力，不讀書，竟然在我這一知半解的青年學生面前失敗，我若一得自喜，不加倍努力，到了將來，恐怕還不如他。因此，我便格外用功，加倍謹慎，從此也就不敢和人放言高論了。

六

我對於測繪學堂也很有興趣，原因是：

(一) 我們在中學堂已多少濡染了一些種族革命的思想，自然對於富國強兵的政策，在當時是贊成的；至少我不討厭這種軍隊的生活——早上站隊點名，吃飯站隊點名，上堂站隊點名，就寢前，站隊點名，當週番生，見官長與教習，舉手立正……

(二) 我是皖北生長的，我的家鄉知與不知的親友有許多在南

京，安慶及日本士官做學生的，不知不覺之間，多少總受了他們一點影響，傾向於軍國民的思想。

所以我對於學堂的規則都小心地遵守，我當過番生也極其認真，現在把我們學堂的內容和我對於學堂的經歷，大致說一說。

先說我們學堂的教育。老牛專門辦事，雖然也帶着教一點功課，實在是敷衍了事，因為他的爲人活絡，大家也就馬馬虎虎。老江雖然不大行他教代數和三角，實在太吃力，且往往碰着難關，但他確實很熱心，且肯與學生親近，就是說，他還有三分學生氣，所以我們也能原諒他。老彭雖然是個酒鬼，但他教功課（測量）卻是非常用心，對於學生也很爽直，大家對他也沒有惡感。只有小劉（桐城人，江南陸師學堂畢業的學生，他那種老氣橫秋，藐視一切的神氣，實在令人討厭。他並不是以嚴

格的師生的態度相處，而是以官長對兵士的牌子對付我們。我頂恨他這一樁。況且他的功課又不行，但是他的利己的方法，卻十二分巧妙。他擔任的是戰術學與地形學。本來這種東西，都有印成的書籍，假使每人發一本，按期講授，實在省事，並且至多不要半年（照學堂例課說話）便可教完。但是我們的劉教習不然，他每逢上堂，自己先把戰術學或地形學的書拿在手中，用粉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黑板上，再由我們把牠轉抄在課本上，一點鐘的工夫抄不了三黑板，講的工夫佔不了十分鐘，所以到了兩年畢業，我們的戰術學與地形學還沒教一半。照實說來，不僅他是這樣，其餘的教習，也很多都是和他要一樣把戲。別的教育，更談不到他們的眼光只注在撫台，督練公所總辦，學生不過是他們高陞的工具罷了。——所以他們最注意禮節。

有一次是我當週番生，照例每天上講堂，上飯堂，起床，就寢，皆須週番生吹哨子集合點名，向各教習及值日週番官報告。此外每天學生請假以及一切日常事務須與學堂堂當局接洽的，都要由週番生代表前往，而學生之行動檢束亦須週番生負責，我是按部就班地樣樣都做到了的。不曉得，怎樣一個不小心，那一次上堂，有一個同學的帽子沒戴好，又可巧碰到那個酒鬼老彭的課，我整隊點名之後，向他行禮報告時，他厲聲問我：『你這個週番生怎麼當的？你望望看，隊員的服裝爲什麼不整齊？你不盡責任！』我當時出其不意，碰了他這一個大釘子，惹起了我的無明業火，我向他頭上一看，有了，隨手，恭恭敬敬向前一步，板着面孔，對老彭舉手行禮道：『不能怪學生的服裝不整齊，也不能怪週番生不盡責，實在因爲老師自己的服裝先不整齊，學生不好干涉他們！』老彭醉

醺醺地睜着眼睛，意思是說，好大的胆，居然碰起我來，大聲問道：「本教習那裏服裝不整齊？快快說來。」我輕輕向他頭上一指：「你看。」大家一看，登時轟然一聲，全班幾十個同學，雷也似的笑起來；老彭把手向自己頭上一摸，登時臉紅起來，連忙自己認錯道：「是我的不是，是我的不是！是！是！大家請上堂。」原來那時正當前清末年，雖然辦洋學堂，練新軍，除了東西洋留學生幾個禿頭外，大家都還是在腦後拖着一根老長的豚尾。軍人和學堂的教習，要穿制服，才把那個尾巴盤在帽子裏，以壯觀瞻。我們的測繪學堂當時就是這樣。老彭吃醉了酒，上堂時沒來得及把辮子盤好，倉倉皇皇地歪戴着帽子，掛上軍刀，東倒西歪地跑了來，所以被我抓住他這個錯處，「以矛攻盾。」當時固然我是勝利了，然而他「老羞成怒」，在講堂上，把功課講完之後，大發牢騷，指桑罵槐地說：「無論

是什麼樣的好學生，好功課，平常分數多，若果教習不給他畢業，那他還是不要吃苦頭，萬事不要太驕傲了。」數了一大泡子。同學的都望着我，還有一些替我「打抱不平」的，在那兒「斥」他。這種事情，在二十多年後的我看來，實在不值一笑，然而當時正是血氣方盛的時候，平素又是被各教習所重視的，自然把這件事當做「奇恥大辱」，況且又有許多同學在那兒鼓動，於是真一鼓氣兒，跑到提調房裏，當着老牛、老江（監學）並且老彭也在場，把週番帶子拿下來，望桌子上一擲，大聲說道：「我做了好幾年學生，自問沒有做錯事，也始終沒有受過這種待遇！不幹了，開除，記大過，隨你辦罷！」說罷，轉身就走；監學、提調各教習都馬上跟了出來，問我什麼事，老彭自己心裏明白，知道有點不對，也跟了出來，意思是在想挽回。同學的都是站在我一方面的，大家見他們來，都大聲喊起來，

「罷課，罷課！教習侮辱學生！罷課！」鬧得正不開交，我心裏一轉念頭，事情本很小，老彭又那樣地可憐，我的臉也要了，再者，「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果真罷了課，風潮鬧大了，同學的一時意氣，必然不會持久，結果，追源禍首，我一個吃虧，不值得，不值得。隨即趁着提調他們惶惑地問話時，收帆轉舵道：「沒有什麼，不過彭老師吃醉了，一時誤會。」又向大家同學道：「沒有事，沒有事，請大家上堂。」於是這一場小小波浪，便登時平靜。

還有一次，大概是第二年暑假大考，參謀處總辦陸費要來學堂督考，前多少天，提調，監學，各教習就忙煞了；尤其是操演，什麼散兵綫咧，變換隊形咧，臥倒預備放，跪放，快放各種動作咧，什麼舉槍立正咧，都在刻意地加緊演習。陸費要來的那天早上五點鐘就起身點名，五點三十分

吃飯，六點鐘便吹集合號。全體學生全副武裝在文昌宮外新築的操場上集合，服裝檢查後，即由週番生率領到學堂大門口排隊等候。據說，這位陸費總辦本來有兩口癮，那天在他還算是個大早，十一點鐘就起床，洗臉，過癮，吃早點，諸事停當，已經是十二點多鐘了，這才傳伺候，上轎，到了學堂，已經是太陽偏西了。大家不但站得腿酸，並且餓得肚痛，自然等得心焦，各人的火星子都在那兒直向外冒了。世間許多事，真是一無巧不成書。照例，官長坐轎，碰到大隊歡迎，應當老遠地下轎，步行前來答禮。這位陸費先生自然是覺得麻煩不過，希圖省事，他老先生率性坐着綠呢帷子大轎，前扶後擁地直打我們歡迎的隊伍前走過去了；我們對他舉槍致敬；他也似理不理地點點頭。教練處總辦宋芳賓到底是個學生出身，知趣一點，到操場上便下轎走進門來。大家登時轟起來；我和龔

克定，卽龔瞎子鬧得更激昂。大家的刺刀本已經取下了，瞎子一聲口令，「上刺刀，」只聽「噉」地一聲，刺刀馬上又上好了。我們又喊「請提調來，」老牛面色雪白喘噓噓地跑了來，連聲說道：「大家不必，」又解釋道：「陸費總辦一向對大家同學都很好的，今天是轎夫不好，回去要嚴辦他們，」一時宋總辦也來解勸。大家憤不可遏，龔瞎子說：「搗密子（妹子）的什麼總辦，擺洪東私（什麼東西）臭架子。非打他不可。他現在在文昌閣子上，大家一齊去好了。」同學的自然跟着鬧的，一時槍托子的聲音，和皮鞋子踏地的聲音震天價響。老牛一班人嚇得面無人色，百般敷衍，恨不得作揖打恭。文昌宮是個四方形盒子式的房子，當中一個文昌閣。地面本不甚大，前邊大聲說話，後面聽得清清楚楚，我們在大門鬧得翻江倒海，陸費那有不聽見的道理？他聽見是爲他而發的，知

道勢頭不妙，偷偷地走文昌閣後身下來，開開學堂後門，打操場上坐轎子溜了。趕到大家曉得，他已經安然到了督練公所，這場滑稽劇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在我們學堂，值得大書特書的，可算只這兩件稍微起點波瀾的史實。此外還有一件，也應該鄭重敘述一下的，就是我們吃飯問題，因為這種吃飯方法，使嚴二胖子大苦惱。我們的飯堂是合西菜館和教室而一之的格式：學生坐在長桌子兩邊，每日三餐都是乾飯，每餐每人一菜一湯，週番官上堂和我們同食不同桌；他另在食堂的一邊的壇上設一座位，獨自一人去吃，吃的東西是一樣的，但是每餐的時間，平均沒有五分鐘，週番官上堂吃飯不過是個官樣文章，他們在屋裏還開着成大桌子雞呀肉的菜在那兒等，每逢上堂吃飯，簡直如臨大敵，大家因此也就加

速度地快吃，快的不到五分鐘，便完事，比衝鋒陷陣還要努力。因為落後不得，週番官少少吃一口飯，應應場面，他一見大家吃的差不多，便把哨子一吹，你不曾吃完，也得快快地放下，跟着大家出去站隊。嚴二胖子每逢吃飯必落後，每逢落後必大罵，就是這個道理。這也不能怪他，他的食量特別大，任你怎樣加速馬力，可惜自然只給他生下那大的食腔，不能像囊橐一樣，大量地裝進去！讀者，若果要我敘述我們學堂的教育史，我只能舉出這幾件犖犖大者，其他瑣屑更不值得形之筆墨，而且也久已在我的記憶中消逝了。這種教育的功罪，自然不應由我們學生擔負的，也不能完全由那時負直接教育之責的提調，監學，教習等等來擔負，這是時代和社會的現實的責任呵。

我們學生並不是生來不長進，也不是生來自甘暴棄的。平心而論，全校一百多學生，除了龔瞎子，尹詩人幾個特出人物外，大都是用功的。龔瞎子在「二營」當過兵，他的外邊「勤務」多一點，逛「私門頭」（安慶私娼的別名）也是他的「野外勤務」之一；我有一次晚上就跟他跑過一家，就在我們學堂左手，操場後身。跑進去之後，有兩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出來招待，滿殷勤，我也居然有勇氣，上前摸摸她們的奶頭。龔瞎子比起我們來，是老江湖了，但我却只這一遭。尹詩人是我給他上的徽號，因為他不愛做工課，却愛哼詩。我和他們都不大接近，我也沒有別的嗜好。弄到錢了，和盛寔中，朱篤之三人合股，買幾斤牛肉和豬肉，回漢兩教。一共和，一把洋磁臉盆做鍋，冬天在自修室烘火，順便在爐子上燉好了，老盛喜歡喝二兩，我有時和老朱也各人陪一杯，豬牛合璧的紅燒，香噴

噴的一大盆，大啖一頓，如登天界，這就是我們的娛樂。我和老盛、老朱在一個自修室。老朱身體太壞，不能用工；老盛和我都是幹得很吃勁的，自然彼此不能沒有競爭心。測繪學是我們主要的科目；我們對於這一科的書籍也就特別注意。加之，當時測量的書籍實在少得很，那裏看見這樣一本書，簡直是如獲至寶。老盛不曉得在什麼地方買了一部測量學的書，線裝的四本，是一個中國人做的。我向他借讀，他不肯；大有一杯不離手，手不離杯的樣子。我沒法，只得另打主意。晚上九點鐘，點名就寢，我老早就上床，假裝睡覺，熄燈而後，便從床上輕輕地起來。自修室的鑰匙和自來火，我是預先準備好了的。開了自修室的門，又開了他的書桌上的抽屜，把他的秘寶找出來，一頁一頁地抄，足足有十夜工夫。我把他的一部書中要緊的東西都偷了來，老盛還不曉得。

我在那時是個窮學生，父親在家賦閑，沒有多少錢寄給我用；學堂裏雖然供給服裝火食，每月的零用和必要的書報費簡直沒有地方出。一旦遇見意外的事，更是沒有辦法。第二年下學期，將要畢業的時候，我的左臀上生了一個腫毒，紅腫高大，痛得異常。大家同學的都勸我到聖公會（醫院）開刀，因為急於要牠好，免得耽誤畢業，終於聽他們的話，到聖公會去割了。住的是每天兩角的普通房間，飯食醫藥通統在內，割的時候，醫生給我吃的迷藥，到不覺得痛苦；醫院的火食也不比我們學堂的差，或許還要好一點，只是施行手術以後，病痛去了，兼之出血太多，心裏總覺得缺乏油水，饑得要命；但是手中沒有多錢，怎麼辦呢？正好我的老師，即從前在鳳陽經世學堂的總教習李筱園先生到省城來了。那時馮夢華做安徽藩司，李先生就在他那兒當差使。聽說我病在醫院，特

地跑去看我，臨走時，從荷包裏掏出一塊大洋來給我，叮嚀囑咐地道：『你病後，應該吃點好東西，這裏一塊錢給你用罷。』在現在看來，一塊錢算不得什麼，但是當時的一塊錢却是很值得重視的，而且李老先生當時在馮藩司那兒當文案，只五十兩銀子一個月，廉潔自持，他這一塊錢，更是可感！

平心而論，那時的聖公會醫院還算好，我們兩角錢一天的病人，開刀以後，每天朝晨或晚上，每人還有一杯牛肉湯兩個荷包雞蛋，這比現在上海的中國人設的醫院的半塊錢一天的普通房間的待遇還要好。不過有一樁討厭，每天晚上，總有一個神甫到我們病房來宣講福音，宣講畢，他就來和我們糾纏，勸我們信教。我那時已經受了一點科學思想的影響，隱約地成了一個所謂『自由人』的意識，我就老實地告訴他，

我不信教，除非你有一天能以說得使我相信上帝。宣教的神甫乍聽着，雖然有點失望，但他卻不灰心，第二天又來了，第三天仍然是來。其中有些病家果然被他把靈魂收去了，做了他的信徒，我仍然是不爲所動，並且有點討厭了。那天晚上，那位牧師穿着黑長袍子，左膀子夾着聖經又來了，首先他就對我進攻，而大講其創世紀。我劈頭就問：

「什麼叫做『創世紀』？」

「創世紀就是記載上帝創造世界的聖靈的經書。」

我又問他：

「據你說，世界是上帝造的，那麼上帝又是誰造的呢？」

他馬上對着胸口畫了一畫十字，嘴裏咕咕道：

「異教徒！異教徒！上帝是唯一的神，如何可以這樣地褻瀆！」

我又說道：

「你若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滿意的答覆，那我就一定不會做你的信徒！」

牧師睜着他那一對蘊藏着機警詭計而貌似忠厚的眼睛注視着我，口裏念道：

「不信上帝，要受來世的懲罰的！」

說着又轉向別的病人說教去了。我當時胡謔了兩首絕詩紀述我的感想：

病體支離百吟呻，

爲誰說教去來頻？

男兒自有靈魂在，

上帝何須強作人？

滿目瘡痍百感並，
倉皇戎馬一書生；
他年若得沙場死，
不作神仙氣也平！

漫向人間說窮冥，
耶和華事有誰聽？
蒼茫獨立風塵裏，
我有良知是聖經！

這些詩自然幼稚得很，而且十足的唯心論的英雄主義，但是牠至少可以表現出我後來反抗宗教的精神的萌芽！

七

我的創口漸漸地好了，正想回到學堂去，可巧老朱那天來了，說我們學堂快畢業了，不久就停課。在畢業大考之前，還須有一個月地演習，地點已指定距安慶城四十里的龍珠山。屆時全體同學都得出發，全校教職員也須同陣前往，隨時指導。我聽了這話，馬上就開了醫院的賬，攜着簡單的行李，同老朱一陣回學堂了。

說起來我們的測繪學堂的課程，着實可憐！原來測繪有兩種：一種

三角測量；一種是地形測量。三角測量是用高等算術，立體三角，立好水準差與標高，測好大三角點，然後再分區測量。所測繪的地圖，比較的準確，這種測繪的人材教育分三股：三角股，地形股與製圖股。此種辦法，人材與經濟都要比較大的規模，而需時亦較長久。我們安徽當時既短於財，又短於才，而當道又亟亟成立新軍，不能久待，遂先開辦陸軍測繪學堂，專從事於平面地形的測量以濟軍用。所以我們學堂的學科非常淺薄；若果教者盡心竭力不有意拖延，再加以學生都有普通的數學程度，三個月便可畢業。現在弄到兩年多，應有的功課如戰術學地形學之類，還沒教一半，也只得馬馬虎虎地畢業了。這種測量的目的只在指示山川形勝及道路橋梁之方位以及大概的比例，又加上我們的技能的練習與科學的知識太差，更有點靠不住。我們的三十天的演習本也是一

種例行公事。不過大家到鄉間去白相一陣子，好交代公事。

這時，我們的測量教習，換了一個姓程的，江蘇人，也是陸師學堂的學生，他的本領還不如老彭，但是他的爲人卻比老彭活潑多了，事事都能隨彎就圓。他帶領我們到山上或遠處村莊去測量，在那時倒合我們的口味，三五團團地圍坐在野外或山巔的樹蔭下乘涼談天，一天測不上兩三點個基本點。我們所用的測量儀器，有兩種：一種是德國貨，名叫齊普雷格爾；一種是日本貨，名叫測斜照準儀。前者的鏡管裏面有望遠鏡，可以看三千至四千米達，水準器和羅盤都很精確，測出來的距離差數比較小，所以我們拿牠做主要的測量儀器；後者沒有望遠鏡，全恃目力，水準器與羅盤針又不準，差數自然大，且只能測五六百米達的小距離，所以我們把牠作爲輔助工具。每一個基點選定之後，先用齊普雷格

爾測定這個基點之外的三角點，然後再用「測斜照準儀」在每一個三角之內作局部的測繪；各人測繪之後，把各局部的形勢再照比例縮畫到齊普雷格爾的測圖板上。我們的圖是兩萬分之一的比例，比較也算詳細的了，可是錯得也就不在少處，好在我們的測量教習的神通廣大，他有女媧氏鍊石補天，費長房縮地和精禽填海的本領；晚上大家在一塊湊起白天所測繪的地圖來，差數太大了，就要找老程想法子；他一點也不躊躇，只要鉛筆和橡皮多做點工作就完事了，往往一村一莊，一溪一邱或一個小道，一座小山，在軍事上有決定的重要的，都在他的筆下鈎銷了，或在他的橡皮下抹撥了。我們橫豎是玩，只要有人替我們負責交卷，那就心滿意足。

我和朱四老盛三個人是不離伴的，有時嚴二胖子和他的老三也

加入，不過大家都因爲他太小氣，又喜歡佔小便宜，有些時候我們總是背着他們跑到附近山莊裡去合股買雞吃，雞買來了，廚子司務是朱四和老盛，我和小嚴只是做下手，拾柴薪，燒火，到人家去買酒，油，鹽，醬等等，樂是真樂，提調和教習等也是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不管事。我們此時很有接近農民的機會，並且有充足注意農村生活的時間與可能，可惜爲我們那個時代的物質條件與社會的，政治的環境所限，使我們不能意識到下面幾件事業：

(一) 注意農村經濟之一般的現象，如土壤之肥瘠，氣候之寒暖，五穀之栽培，等等。

(二) 注意農村之土地關係，如土地私有制，土地公有制與國有制的區別與互相交錯的關係；佃農與地主的關係；貧農與佃農的關係。

(三) 注意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的情形封建制度的農村破產的眞象；農村每年與城市人口消長的比較。

(四) 注意農村中之階級分化的情形，高利貸的剝削與階級鬥爭的事實。

(五) 注意農民的各種組織。

(六) 注意農民與城市的關係，農民對於政治的觀念和情緒。

這些問題在現在都是很粗淺，很一般地提出於每一個稍有常識的人之前，不會惹起人的驚異；然而在那時，我們作夢也不會夢想到。所以我們那時對於鄉村野外所感得到的，只是一種浪漫的心情。就是一點種族革命的情緒也是本能地，不自覺地在潛伏着，還沒有引動的要求與組織的參加。

有一天，我們正在出發到野外去演習，忽然來了三四匹馬；一匹馬上坐着一個穿竹青官紗大衫，踏着破薄底緞鞋，年紀已有四十上下的雞瘦小個兒；後邊兩匹馬上的，是兩個東洋學生裝的美少年，我們趕快去報告提調，說省城裏有什麼客來了。提調出來一看，馬上就老遠地必恭必敬地對着那位小個兒行禮。那位小個兒，稀稀的幾根小鬍子，連忙下了馬，笑嘻嘻地回禮，提調又恭恭敬敬地請道：『請大人到裏面去休息。』大家都有點詫異。原來在新軍創立以來，營長或少校階級的官兒，勤務兵都稱呼他做大人，不算什麼稀奇。不過我們提調的帽子上已經戴的藍寶石，差不多是上校階級，他稱那位小個兒做『大人』，而且是一恭而且敬，一立正舉手，恐怕有點別的來歷。我們知道提調是忙着招待去了，沒有工夫回答我們的話，只得找老江，老江扭着頭兒，一奔三跳地，

果然來了。他告訴我們，剛才來的那位穿大衫的官，就是警察學堂的總辦，那兩個穿學生裝的是他的朋友。這位總辦姓徐，名字叫「錫麟」。他的兩個朋友，一個叫做「陳伯平」，一個叫做「馬志希(?)」。他們都在日本留過學。聽說撫台極相信徐總辦，不久就有升任巡警道的希望。大帥早有此意，不過因為他回國不久，司道皆以資望尚淺，極力反對，大帥格於衆意，只好暫且放下，但他的紅運在後頭咧。老實說，老徐辦事確極熱心，一點官僚架子都沒有，你看他一個人都不帶，這不是真憑實據嗎？大家都有點心熱了，還想談下去，然而老程催我們出發，各班班長也在吹哨子集合，我們只得把話中止，「心不在焉」地走了。我們一路上的談話，自然都是集中在徐錫麟，徐總辦身上，有的說，「他那一點點小個兒，怎麼像個大人？」有的說，「他後邊還拖着一條小辮兒，那裏出過東洋？」又

有人說，「那兩個洋學生和徐總辦有什麼關係？他們一定是親戚，再不然，他就是他們的老師，我不聽說，現在的學生都找着候補道做門生？」有一個搶着問道，「誰說他是候補道？我看他有點不像，一點候補道的氣味都沒有？」七嘴八舌，我卻不敢多所主張，只是聽，有時問一兩句，也不願胡說亂道。正說話間，程老師從後面趕來了，說我們昨天測的就是那個高埠，今天我們就在那兒起點，把三脚架安在那裏好了。「高超」你同他們去。我就趁機要求道：「老師你也得去，我們昨天測的，還有一點合不到一塊，差數太大，那個山脚下的一條大路和一道水溝都沒有畫上，你得去糾正一下。」我這話是冠冕堂皇，輕也不說的，因為實際上，我們不需要他，平常他不和我們這一班在一塊，我們正求之不得；今天我這一說，他自然不知底裏，照理是必然要跟着我們，我可順便從他探

聽徐錫麟的來歷。他也不大清楚，只說他是浙江人，並且是個貴公子，他的親戚現在還做某省巡撫。他在東洋學習警察，回來又捐了候補道；他們的角路很大，恩撫台沒出京，就有人特別地保薦他；兼之他自己也着實有能耐，警察學堂辦得真有精神，所以恩撫台非常器重他，前天還有兼任陸軍小學堂總辦的消息。我又問他，「今天徐總辦他們來到龍珠山，莫非有什麼公事不成？或是撫台教他來調查我們的功課的？」老程帶一種疑問的神氣，彷彿勾起他的什麼心思似的，把頭一昂，臉一紅道，「怕未必！」

到了下午，我便運動大家要求老程收班回山，說是大家疲倦了，早些回罷，老程在平常固然是十二分地贊成，惟恐你不要求；今天卻有點躊躇了，掏出表來看看，說「才三點鐘，還早着咧，」無奈大家都是歸心

似箭，不等待他許可，已經叫齋夫把三脚架，標桿等等東西，一齊收起，講着，笑着走了，老程沒法，只好也跟着走。

回到龍珠山，太陽還未下山，大家都抱着一種好奇心，想去探望徐總辦的行動。那曉得他已經走了，據說，他到了龍珠山稍微同提調周旋一下，便和陳馬兩人又騎馬到四處去遊玩，現在還未回來。不久果然回來了，老牛請他們過來吃飯，他們也謝絕，廟裏老和尚一桌齋三人自己吃了。吃過飯，向老和尚借了幾張板床，就在大殿的廊下，枕着蒲團，都伸直了腿，呼呼地睡去。第二天一大早就騎着馬走了，大家這才曉得，他們是來遊玩的，老程心裏也才放下一塊石頭，知道他並不是奉撫台的命來考察我們的功課的。

我們實地演習快兩個星期了，那天下午牛提調忽然把我，喬世賢，

黎白炎，朱老四四個人找了去，手裏拿着兩封公文，笑謎謎地說：「派你們進城去。」我們莫明其妙，他把信給我們一看，才曉得是一封警察學堂趙提調的公函，一封是督練公所參謀處的札子。我們先看趙提調的信，大意說：「敝校學生畢業在卽，官兵生數百人，卽將派往各區服務，惟以省城地圖尙未測繪，崗位及派出所無由規定。素仰貴校學生對於測繪素所擅長，務請遴派高材生四名前來敝校趕繪城廂略圖，以便指導，實爲公便，除咨請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外，合行函知，卽希察照云云。」再看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來札，大意相同，無非是准據警察學堂總辦徐函開云云，望卽照辦等等的話頭。我們自然是情願的，不過恐怕實習沒有完，有碍畢業。老牛笑道：「你們去辦公事，自然要優待，所有實習成績，均照優等給分；而且你們去這一趟，總算一點成績，將來畢業後，更有經驗

去辦事。我所以選派你們四人，也是因為你們平常都很老成，出去不會給我丟臉；徐總辦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趙提調也是辦事極有經驗的，他是我的朋友，諸事都可以特別照顧你們；我已寫信托付他。你們只管大着膽子去，有什麼難問題來找我好了。」說罷，又從抽屜裏拿出一封公文來，說：「你們把這件公事拿去。」另外又給我們每人五塊錢，說：「這做你們的零用；明天就一早進城罷。」

在這裏，我得叙一叙警察學堂的始末及其組織。警察學堂也是恩撫台當時的新政之一，和他的新軍與高等學堂的改組，剛剛鼎足而三。警察學堂在安慶城內東北腳下，安慶人都叫那一帶地方做「百花亭」；旁邊不遠有一個宋公祠，是戚同之交的淮軍名將宋朝儒的祠堂，宋爲安徽懷遠人，所以皖北教育會就借那裏做會所。皖北教育會的正副會

長是童茂仙和竇子敬，吳性之是會中祕書；他時常在會裏辦事，因此我們也就常常經過警察學堂到皖北教育會去，但老吳並不住在裏面，他因為吸鴉片的關係，住在距宋公祠不遠一家民房裏。在那裏曾經和在警察學堂讀書的一些朋友往來，所以我們得到關於牠的一些零碎的材料，大致是這樣——

警察學堂學生共有五百人，分官生和兵生兩班；官生百餘人，兵生三百餘人。怎麼叫做官生呢？他們大概都是各縣的世家子弟，就是說，都是官僚和大地主的子弟，再不然，自己就是廩貢生員，甚至還有舉人在裏面。我有兩個朋友，一個是朱檢之，即朱篤之的老兄，一個是瞿紹亭，是鳳陽縣的舉人，都是警察學堂的官生；他們畢業之後，馬上就可做警官。兵生呢？他們都是各縣的窮學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子弟或各縣小

學的學生。他們畢業之後，是派往各處當班長頭目。因此，他們兩班的功課也就各有偏重。官生班注重堂內功課如警察法規及普通法律智識；兵生班則注重堂外功課即兵操。一個學堂裏面，儼然表現出兩個不同的集團：一個是官腔官調，老氣橫秋，咬文嚼字，折節卑躬；一個是頗帶有雄抖抖，氣昂昂，男兒身手的神氣。這不是偶然的現象，乃是他們的社會來源與夫政治上的環境有以形成的。就是說，不僅是在官兵生的班次形式上形成他們的行為上的對立，尤其是他們的階級的利益上決定他們心理上的衝突。官生開口就是違警律，閉口也是「警察的責任在防患於未然」或是「維持秩序」；他們的談天資料總是「中丞怎樣」「大帥如何」；他們的嘴上大概都留得幾根八字鬚，那時最流行的是日本式的小鬚子；這種鬚可是以日本的仁丹廣告上的鬚子為標本，所

以大家都叫他做「仁丹鬍子」。爲什麼要留鬍子呢？理由本很簡單，一來是，一般的心理，無論你是人是鬼，只要你一留鬍子，大家似乎便覺得你老成了；二來是，惟其如此，做官所以必要有鬍子，才可以有威可畏，更表現他的服官臨民的經驗。他們見了總辦和教習等，總是望旁邊一站，從前的馬蹄袖子雖然沒有了，然久長時間的遺傳和習慣，還是保存着，兩手稍向後，筆直地垂着，腰望前彎，有時本能地還表演出打恭，請安的姿態。他們的腦子裏，自然沒有別的信條，除了「衣食父母，陞官發財」這幾個大字。他們雖有學校的制服，但是在他們看來，真是「告朔之餼羊」，不到舉行大典，迫不得已時，他們是不會穿的。他們的常服大都是八團小花開氣袍，八團天青馬褂，腰裏掛着肩囊，或是掛着眼鏡盒，崑秋小帽，薄底官靴。他們在先天中就沒有帶來一點反抗性（這或許是有

點唯心論的感情口氣，而他們口頭上所掛的「國家深仁厚澤數百年」的招牌，也是等於上海「鹹肉莊」裏面的「我愛儂」的情話，是沒有兌現的保證的。兵生却另是一個世界，因為官生看他們等於綠營的弟兄，他們官生儼然是官長，見了兵生不期然而然地就擺出那種臭架子；在官生看來，兵生都是些奴才，他們將來一旦做了兵生的長官，兵生見了他們是要服服帖帖地尊敬他們的，要立正鞠躬；他們對於兵生將來的運命有決定權能，想到這裏，自然就傲然自大起來了。兵生比他們更了解這一層，他們更看不起官生。他們罵官生是小老爺，小候補，甚至有些人還背地罵他們是滿清的走狗之小走狗；他們總有一天打碎這些小老爺的飯碗，拔掉他們的鬍子。他們在學堂中，不是喊口令，就是操槍操；或是翻槓子，走浪橋，跑木馬，再不然就是練習打靶。他們對於官

生慢不爲禮有些年輕性躁的，甚至當面嘲笑官生。他們人人都穿着學堂的兵生的制服，這一來是因爲他們覺得這種制服不但毫不侮辱他們，並且他們以爲牠是他們軍國民精神的象徵，二來是，兵生大約都是貧窮的小市民和鄉村中的自耕農；他們自有生以來，本來就沒穿過什麼好衣服。他們的地位並不比兵士高，平時被土豪劣紳地保差役所欺凌，所魚肉，現在有件這樣老虎皮罩在身上，已經覺得是無上的光榮。他們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是個兵士；原來這些兵生，很有許多都是『三營』的兵士的轉胎。他們的前生已種下不少反抗的遺傳性。當時『三營』這個名詞，在安慶城裏是很叫得響的；就在安徽革命史上，也有牠的相當的光榮的意義。

出安慶北門二里多路，有一座兵房，差不多有一里見方的面積，高

踞在山坡上，雄視着全城；東北二里許有安徽武備學堂和牠對峙；再東北行則有五里廟的新營房。這個新營房初建築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常常騎馬馳騁其間，隨着老牛去測繪營基圖；由南門出城到五里廟，必經過砲兵營，砲兵營在迎江寺北首。三營，五里廟，砲兵營與武備學堂，差不多成了一個連鷄之勢。三營之西南二里多路則有騎兵營，工程隊，輜重隊，一直綿延到大觀亭，差不多在陸地上把安慶城的三面，包圍在武裝的核心裏，而三營隱然有領袖一切的形勢。因爲三營從前的管帶是顧忠深，顧氏曾經在練兵營培植了許多有種族革命思想的下級幹部。他當管帶的時候，通統把好的挑到三營當班長和排連長，我們家鄉的青年被他們吸收出來當兵的，很是不少。因此，三營的革命空氣，也就很濃厚；後來顧氏雖因事他去，然而革命的情緒還依然保持着。警察學堂

兵生招考他們一部分就轉投警察來。假使警察學堂的兵生沒有這段的前史，那聽憑徐錫麟怎樣大的煽動本領，組織天才，也斷乎不能把整個的兵生隊抓在手裏，而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夏天的一百『花亭畔』也翻不出那樣掀動滿清政權的血花來。我們追本窮源，不能不回溯到三營與警察學堂兵生的親屬關係。一九一一年安慶獨立後，我有三首絕詩追憶其事：

醉後重臨博浪沙，百花亭畔隱悲笳！

無端歌哭秋風裏，欲出北門苦憶家！

華宴難逢舊事非，簷前燕子盡南飛！

將軍如鼠藏頭去，烈士當年手一揮。

壯士原來不愛身，草間白骨已成塵。

眼前多少英雄裏，值得依依有幾人？

八

警察學堂也是一座舊式改造的建築，牠一共是六徑；每徑是十間。官生的房舍在左邊，兵生的房舍在右邊；學堂的大門外便是一個大操場。我們到了警察學堂見了趙提調，由他向徐總辦轉達；那時老徐正忙，沒有見我們，就把我們送到第二徑右邊兩間大廳上去住；一間是我們

的辦公室；一間是我們四人的寢室。徐總辦就住在第三徑當中三間：當中一間是他的會客室；左邊一間是他的臥房；右邊一間是他的簽押房；和他與人談心的密室。那時我們四人都還是一個簡單的技術人材；我雖然在中學堂裏也曾受了一點不健全的種族革命的歷史的薰陶，然

而還沒有行動上的要求更沒有加入任何政治團體，也不會與任何革命組織有關係。我們到了警察學堂還是一心一意地在繪圖。我對於繪圖，那時也頗有興趣，畫山脈和水線，在同班中，我是數一數二的，不過對於城廂的街市圖，只是些橫豎的直線那樣單純的繪圖，我是不大熱心的。我們之中，白炎的纖巧的手指和世賢的耐性子，做這個工作很適宜，他們也很有興趣，而且這或許是一個前程，所以他們也高興。朱老四對於此道是徒有其名，這並不是說他另外有什麼高遠的志趣，實在是因爲他在他的一個世交的名宦府中，偷了那位名宦的一個小老婆，朝朝暮暮報效得太厲害，所有一點精銳都消耗盡了；後來被人發覺，倉卒而別，那一雙失戀與奮鬥失敗的灰色無光的眼睛，處處表現得他的精神再沒有繼續鼓勵起來的可能，所以他對於工作，也就得過且過，得數

衍且敷衍。我呢？比他們三個年紀都輕，雖然還蘊藏着一點人生的火燄，但却還在地層底下，未有引火的導線和燃燒的材料，工作雖然沒有世賢和白炎那樣地緊張，然而卻也沒有朱老四那樣地頹喪。有時，我也和警察學堂中幾個同鄉的兵生閒談，他們異口同聲的稱贊徐總辦，我當時就很奇怪；因為那時的學生的氣燄非常兇，任你什麼總辦，也不能得到一般學生的信仰。以下是他們告訴我們的話：

「徐總辦雖然是個道班，雖然是撫台面前的一個紅人，紅候補道，但他卻沒有一點官腔官調。他的相貌雖然與平常官僚沒有什麼不同，然而他的行爲，確非一般官僚，尤其是司道以上的大官所能做到的。

「第一，他有他的特殊的眼光。他對於官生的態度很平常，雖然他們對他極力表示恭順服從；對於我們（兵生）卻異常親熱。他和我們

在一塊兒吃飯，和我們在操場上一塊兒上操，他演說時，總說將來國家的富強之基，就在於我們這些軍國民，腐敗官僚是沒有分的。官生對他行禮，他馬上把候補道的架子拿出來，睨也不睨；兵生對他行禮，他却異常鄭重，答禮如儀。

「第二，他有大人物與士卒同甘苦的精神。我們兵生三百多人，每天晚上就寢以後，他必親自一一查看，誰人把被單弄掉了，他就輕輕地給你拾起來蓋好；那裏窗戶沒關，風大了，他便輕輕地把窗戶給你關好。那個兵生害了病，他必須親自給你配藥，給你煎藥，照應着你吃；並且時時刻刻來問你；經濟上有什麼不尷尬的時候，他又極樂意地幫助你。他常時說，總辦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的事，就是總辦的事。」

「第三，他非常勤勞。自從他辦理這個學堂以來，沒有那天不是一

大早就上操場教習們自然也沒有偷懶的了。他又非常注意軍事體操，一個禮拜總要帶我們到城外小校場打兩次靶，近來快畢業了，老徐和我們更加親密，打靶也就來得更勤，差不多這幾天，天天早上五點鐘就要跟我們一陣出去。他說，警察不但要用棍子，並且要用槍；不但要打小毛賊，並且要打大敵人，才算好漢，好男兒，話也是不錯。

「他還有兩個朋友，一個姓陳的，一個姓馬的，都是東洋留學生，現在也住在這裏，天天來和我們談心，都非常有學問。他們兩個都是和尙頭怪有趣。」

「他這樣的精明強幹撫台自然喜歡他，因而全省的文武官員也就都和他要好。前天徐總辦還在海洞春請客呢，所有新軍的官長，如于協統于大宏，章標統章和卿，古標統古作唐以及砲兵管帶，騎兵管帶，憲

兵管帶那一個不到聽說，他們都很欽佩徐總辦，這傢伙真可以……」。

我們聽見雖然生了一種羨慕他們的心思，然而我們的機械的工
作牽絆着我們，使我們的神經對於這些關係不發生多大的注意力，而
且我們，尤其是我，還是被曾文正公的求缺齋日記，曾文正公家書與曾
胡批牘，張江陵書牘，陽明全集支配着的時代，對於這些暗伏着極深切
的社會變動的徵兆，還感覺不到刺激，而且我們「老成持重」的倫理
觀念，對於那些和尚頭的東洋留學生，還格格不入。有一天，大概是下午
三點鐘的時候，天氣很熱，太陽光從窗戶裏射進來，大家工作都停了，正
在談天，忽然齋夫來說，石老爺來了！話還未落音，一個一奔三跳的二十
幾歲的雄抖抖的和和尚頭跑進來了；短褲頭兒，毛森森的腿肚子露在外
面，長統襪子，黑皮鞋。上身也只穿了一件短袖子的衛生衣，兩個膀臂比

我的大腿還粗，胳膊上的筋鼓多高，握著拳頭一點也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毛遂自薦』道：『我叫石劍俠，懷遠縣人，現在在此地擔任體操教習，聽說你們到這裏畫圖，大家都是同鄉，兄弟非常喜歡，特地來奉訪……』我們同他談了半天，談得不入港。他走的時候，又說『我就住在你們的樓上，沒事請過來談談。』我們四個人爲了此事曾商議過一次。他們主張去回看他，因爲這是『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則極力反對，理由是此人太輕佻，同我們談話一點不着實際，他的究竟我們也不清楚，我們的交際似乎不可太冒失，而且他是徐總辦的人，我們最好暫且不必同他往來，免得人家說我們去鑽門路。這時我們並絲毫沒有知道徐錫麟的究竟，這樣的『不去回拜』的辦法，實在是我們孤介的習性，還不曾脫除，就是說，農村的孤獨或鄉曲之士的閉關自

守的見解還未從封建殘餘的環境中解放出來，所以我們對於那位石君有那樣不近情理的態度。第二天，我們同學堂裏一個兵生談及，才曉得，這位石君的體育很好，工夫很不差，他的中國拳術，據說也不壞。他運氣的時候，肚子上，可以用石頭用力地打擊，毫不感覺癢痛，也不致受傷。他們都談虎色變地稱贊他。這種本領，實在不算什麼奇事，朱家寶撫皖時代安徽督練公所稽察長（？）李某也有這種本領，差不多的磚牆，只要他一拳頭，就可打成一個洞。我的一個經世中學堂的同学，後來又是測繪學堂的同学朱杏邨，他也可以玩這種花樣。他只要把氣一運，把肚子一挺，肚子便鼓起來，上面大大小小的許多包，像我們這種沒有氣力的人打牠兩拳頭，他也覺不得什麼。然而在當時的我們看來，差不多也就是「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了。

徐錫麟的爲人，到了這時，我們還不知道，不過覺得他是官僚之中一個特殊的人材罷了；我從前以馮煦爲清之循吏，這時也大有以老徐爲當時能吏的心理，沒有別的印象，於此也可見得我的思想，在這個時候還未脫離蒙昧狀態。

我們天天是在畫地圖，沒有工夫多與警察學堂的學生往還，因爲老徐和老趙鎮日價在籌備辦畢業；據說，這一次畢業非常鄭重的，畢業典禮已經籌備了多少天，打算把全省的高級官吏和各機關的重要人員都請了來，撫台和司道都要親自參加。學堂裏預備兩百桌席面，早間並有點心，我們幾個測繪員當然也是很高興的，眼巴巴地望着這一天到來。日子來得也快，那一天早上，我起了一個大早，自己打算溜到學堂

外去散步，一出房門，便聽見一隊隊伍的腳步聲，隊伍的一部分已經走出大門，並且都揸着槍，我不能出去，只得在旁邊候；到了隊伍走完，才看見徐總辦穿着軍服，掛着刀，督隊進行，我這時退也不能，進也不能，只好向他行了一個禮，等他出去了，我再慢慢地走出大門；有兩個官生的學生在那兒閒談道：「老徐這一大早就帶他們去打靶，做什麼用？」我這才知道，他是帶學生出去打靶的。

百花亭的左近要算安慶城內空氣最好的地方；旁邊有一道城溝由城下通出去，流到城河，又由城河通過小橋與城外的菱湖相接，亡友韓蒼伯後來有月夜登城望菱湖一首詩寫牠的景物最好：

一塔忽起江水住，

城陰涼月白紛紛。

菱湖欲留大龍尾，
片片荷花夜如雲！

溝的兩旁，也有些半西式的樓房，有三五池塘；塘邊都有幾棵垂楊；垂楊下，有一些婦女已趕早坐在那兒洗衣服，砧聲四起，我望了一回，覺得肚子餓了，便又慢慢地踱回警察學堂。白炎，世賢兩個起來了，朱四還在那兒躺着，我說：「老徐已經帶着學生出去打靶，篤之，你也太懶了，起來罷，免得人家背後指摘。」原來篤之和我最好，他比我年紀大，然他平時却很能受我的忠言，我所以敢直說。老朱聽了我的話，果然一股輪爬起來，嘴裏喊道：「我朱老四是懶王，誰人不知，誰人不曉，老徐，他們是大人先生，自然是希圖進取的，老弟，你我不過是個測繪生，這個搗密子的事情，我真是不吃勁！」說罷他又從新睡下。白炎吸着紙烟，笑瞇瞇地不做聲。

望着我吹烟，把烟吹成一道大小的圈子，慢慢地散去。我向白炎說，「你這煙圈吹得很妙，比我們的山脈和水線畫得還勻整。」「不要開玩笑。」白炎說，「明天這裏非常熱鬧，你不看學堂裏裏外外都紮起彩來了嗎？我們明天也休息一天，看看熱鬧，大家都早點起來，把服裝及床鋪都整理一下，防備有人來參觀，你要曉得，我們是代表全體測繪學堂的名譽的。」老朱從床上一骨碌翻起來，大聲道，「我朱老四明天偏要睡牠一個足，假使你們吃什麼好東西，弄點來給我吃，我是不願意趕熱鬧的。大帥來了，與我卯相干？還不如我們去和性之刮刮（合肥人說「談心」謂之「刮刮」）罷。」

第二天早晨，大家都起來得很早，朱老四雖然懶，但他却很能服從公意，於是也就隨着大家起來了。我對於這種舉行官僚式的典禮，向來

是不甚熱心的，朱老四是個行雲流水的人，他雖有時也發出一些議論，但他始終沒有對於任何事，加了十分的注意力；世賢是個木訥的人，這天也不看見他有什麼意外的興奮；最感興趣的是白炎。他一早爬起來，洗了臉，就在前前後後，跑個不息。我和篤之，世賢三人出了大門，到操場上逛了一逛。大門上滿紮了松枝和紅彩子，大門口樹了一個大旗桿，黃龍旗在大風中飄揚着，似乎特別吃力。操場上，看的人已經是不少了；從大門向裏看，每道門都紮着彩和松枝。那時忙得最厲害的，是趙提調。徐總辦還沒有出來，只看見他在第三徑大廳上，全副武裝，背着手在那兒踱來踱去。我們看得一點趣味也沒有，正待要回去，白炎出來了，他要我們在外邊等着看接撫台。我反對說，「我是要進去了，撫台那個沒見過，有什麼看頭？而且我肚子餓了，要進去找東西吃。」我不等他們的許可，

獨自一個進來了。世賢篤之一刻也進來了，只落白炎一個人在外邊。我們就叫齋夫到廚房裏去要他開早飯，齋夫却用盤子捧了三碗鷄絲麵，一盤點心來，並說道：「撫台到了之後，行過畢業禮，馬上就開酒席，請先生們先吃點麵和點心墊墊肚子。」我們每人吃了一碗鷄絲麵和幾件點心，已經心滿意足，何況中時還有酒席，自然是口水垂下三尺。這時全體教職員學生一齊都集合在大門外操場上，首道懷寧縣早已來了，一刻藩臬，提學使也來了。不多一時，聽見外頭一片聲響：「大帥到了！」大帥到了。」先是一陣參差不齊的靴子聲，間或雜以馬靴的聲音，這大概是什麼協統標統之類的長官，繼而是一陣一陣的踏步聲，這自然是學生的隊伍隨在後面。

大約在半個鐘頭以後，已經快到正午，日光忽由昏暗中放了出來，

熊熊地吐進那暑天的溽濕的氣味，我們想叫齋夫到庶務處拿幾瓶汽水來吃，只聽得後面「拍拍拍……」地連聲響，大家都很詫異。我說：「今天是舉行畢業典禮，不是娶新娘子，爲什麼放起爆竹來了？」「大家畢業，」朱老四說，「都要到社會上服務，這也就和新娘出嫁，或新郎初婚是一樣地值得慶賀，放點爆竹，熱鬧熱鬧，討討吉利，也在情理之中……」正在說得高興的時候，只聽得後面人聲嘈雜，我們從我們的房間出了左手的耳門一看，只見一些人好像獵場裏趕走的兔子一樣，拚命地向外奔，有的把紅纓帽子拿在手裏，喘噓噓地汗流滿面，有的穿着官服，貼在用人背上，帽子上的花翎轉到面前，面無人色地，莫知所措；再看學堂堂當中的道路，也是一樣情形。白炎從人叢中擠了來，臉好像一張白紙似地，一頭鑽進房屋，我們知道不好，也就跟了進來。「不好了！白炎顛

巍巍地說：「撫台被刺了，我們趕緊走……」世賢篤之一言不發，就動手捆行李，我反對地說：「這件事，我們沒有弄明白，馬上就走，實在不妥，最好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房屋暫且關閉，待亂人跑完，我們再走。」篤之說：「不錯，」世賢白炎也就贊成。不多一回，徐總辦就在我們臥室的窗外，沿兵生的寢室一道甬道中，集合學生宣布，說：「大帥被刺，刺客已拿獲正法，現在應武裝保護軍械局。」一面就發子彈給學生，帶着隊走了。我們在屋子裏聽見他這樣宣布，非常佩服他辦事手段靈敏，但不知所拿獲正法的兇犯是什麼人。待他的隊伍走過以後，我們把緊要的東西帶在身邊，房門一鎖，四個人決定回督練公所。走到中間的走道上，回頭向第三徑大廳一看，才看見一個穿着袍套，戴着水晶頂子的死屍，躺在地下。我們當時走得匆匆，急於離開那個是非之地，也就不暇把這個

所謂『已拿獲正法』的兇犯，從他身上想一想。我們從警察學堂到督練公所，若果由大道走的話，一定要走吳性之先生的厲處過，所以我們便進去同他商量一下，他也主張我們馬上回督練公所，由督練公所行文將我們調回。我們走到萬歲宮前面，看見我們的提調老牛帶着他的一隊兵士在街上巡查，那時他兼帶新軍的工程隊，我們給他行禮，他給我們一個眼色，意思是叫我們趕快回學堂去。

我們大家就折回文昌宮，把各事辦妥以後，拿了公文，帶了兩個齋夫，四個人又重新回到警察學堂去搬行李。到學堂門口，鴉雀無聲，一個人影兒也沒有，冷冰冰地，好像進了蒙古大沙漠一樣，身上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朱老四抬頭一看，忽然跑向前幾步，上了台階，望着大門旁邊的牆上，『呵，』他叫道，『這裏，你看！』又大聲地連忙念道：

「今日之事皆係逆道徐錫麟及其黨徒陳伯平馬志希三人所爲……」

「怎麼徐錫麟……三人所爲，」老朱失聲道，「這不是反了嗎？」我急急止住他道：「不要響念下去。」他又繼續讀道：

「查該逆徐錫麟以新進道員，驟邀知遇，薦膺重任，實爲異數。」

老朱又道：「誰人不說呢？實在是異數。」世賢怪道：「朱四真討厭，這個時候，還要加批評，快念快念。」朱四連忙應聲道：「是了，是了。」於是他又接連念下去：

「該逆道果有人心應如何忠義奮發，勉圖報稱，乃竟梟獍爲心，豺狼成性，醉心邪說，無父無君，戕我元良，罪該萬死。天奪其魄，現已成擒，置之大辟，不足蔽辜。」

朱四讀到這裏，聲音格外顫動起來，沒有力量再望下讀；世賢叫道：「朱四真不行！我來！」他接續讀道：

「惟是殺人者死，罪有攸歸；其餘各色人等，縱一時爲所蠱惑，行動乖方，本院亦本國家寬大之意，置諸脅從罔誅之列。所有該校教職員學生等，其各安居勿恐，靜待後命。……切切此諭。」

撫部院示。」

大家看了這個硃諭，胸中起了無數起伏，始而驚訝，繼而恐懼，繼而釋然，繼而歎息。朱老四慢慢地道：「搗他妹子（Meisai），果然有這種事！真是人心大變了！」我和世賢兩個沒有說話，心裏當然很興奮；白炎的臉色非常難看，我說：「你不大好過，趕快進去！」他說：「不是我真嚇煞了！當撫台他們舉行畢業式後，大家正坐在一排靜待照相的時候，我擠在人

叢裏看，只見左邊座上一個人起身，手一抬，「劈拍」一聲，登時大亂起來。學堂裏一位差遣，不錯，就是那位姓顧的，前天還到我們這兒來送東西的，他穿着袍套，戴着大帽，跟着一羣人望外跑，口裏喊道：「總辦打大帥！總辦打大帥！」這位顧差遣馬上又被人抓了回去，當時我也只顧逃跑，沒工夫顧及他，結果如何，不得而知。我回到房間時，神經嚇呆了，兼之這種事情關係重大，當時所以未敢向你們說，照撫院這個硃諭看來，這件事情是徐總辦幹的，當然無疑了；顧差遣恐怕是沒有命了，也許就做了老徐口中的「刺客」而犧牲了，說不定大廳上躺着的那位死老爺，就是顧差遣，也未可知。」說着，大家就急忙地進了學堂，跑到我們的房間。

我們把行李交給我們本校的齋夫，大家又回到吳性之先生那兒去，他那時就是我們的諸葛亮，也就是我們的定心丸。我們初經了這種

非常之變，胸中毫無主張，見了他的態度非常從容鎮靜，我們倒輕鬆了不少。過了一回，一個人張張皇皇地跑進來，頭上也沒有戴帽子，身上只穿着一件襯衫，下面一條灰布操褲，腳上穿着皮鞋；一看，原來是巢縣的葉達仁；他是警察學堂兵生班的學生，我們平常在老吳這兒是很相熟的，大家馬上給他衣服換上，改了裝，讓他透口氣，才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是從軍械局翻牆頭逃出來的。』

九

這件流血的勾當，自然是徐錫麟做的。徐錫麟的原來計畫是要把新軍拿在手中，所以初到安徽，便極力與安徽新軍的協標統及營長等拉攏，尤企圖把陸軍小學堂和警察收為己有；據說，他曾運動兼任陸軍

小學總辦或署理巡警道，當時早已有這等風聲，在前文已經述說過。本來畢業的日期，較着以前規定的日期早了十幾天，因為那時撫台已疊據偵探報告，說有革命黨潛入安慶，預備乘機起事；撫台雖然心裏沒有疑心到徐錫麟，但對於探報所說的也不能不有所預防，所以沒有依從徐錫麟規定的日期，特把警察學堂畢業日期提前。徐錫麟恐怕他們的計畫為老恩窺破，遂不得不倉卒起事。他那天同陳伯平、馬志希三人到龍珠山去遊玩，便是計畫這事的。他的計畫大致如下：

(一) 聯絡新軍的標統和營長等，他舉事的時候，他們以新軍贊助之；

(二) 以他的警察學堂的兵生做主力，於刺殺恩撫後，馬上佔領軍械局；

(三) 在安慶樹起革命排滿的旗幟，號召全國。據說，此項計畫，新軍的兩個標統及其他幾個管帶都表示贊成的，所以他敢毅然決然地採取這種冒險的政策。

那天舉行畢業的時候，徐錫麟一如平時，態度非常鎮靜，恩撫到了學校，他迎接應對都絲毫不亂。舉行畢業禮後，徐錫麟就請恩撫坐在大廳中間，藩臬道府提學使等分坐在兩邊，來賓中的高級軍官也坐在兩旁。警察學堂教職員站在後一排，照相的鏡子還沒架好，陳伯平忽從旁面拔出手槍向着恩撫打來，老恩聽了槍聲，大吃一驚，把身子望後一仰，兩手一架，這槍正中他的右手，打手心穿了過去；老恩的一個巡捕姓戈的，見勢不好，搶上去背着老恩，奪門就跑。徐錫麟看見陳伯平沒有中到要害，也拔出槍來，緊追着戈巡捕，且追且放，有一槍穿過老恩的後

心又穿到戈巡捕的背上，有一槍中了老恩的屁股，兩人都倒在地下；又有一個巡捕搶上來把老恩背起來，拚命地奔了出去。當徐錫麟正追擊老恩的時候，忽然聽見顧差遣在前邊且奔且喊，他就命人把顧氏拖了回來，綁在大廳上跪着，厲聲問道：「你說什麼！你說什麼！」顧差遣這時候已經嚇得魂不附體，低頭求饒，徐錫麟把出指揮刀對着顧差遣的額子猛力就砍，一連砍了好幾下，沒有砍死。陳伯平搶上來對準後心補了一槍，才算結果了他的性命。這時來參加的文武官員都丟盔卸甲地逃得無影無蹤了。徐錫麟便對衆宣布，撫台已打死，遂即率領兵生往佔軍械局，官生自然都是「桃之天天」了。他帶着兵生到了軍械局，軍械局本來沒有什麼準備，自然就唾手而得。

但新軍並沒有響應他，雖佔了軍械局，並不能增長他的革命力量。

一來是安徽的軍械局那時本來沒有多少新式的武器；二來縱有新式的武器，也沒有人用，因為他並沒有可以武裝的羣衆；三來，他的二三百個警察學堂的兵生，一多半是沒有什麼多大的訓練的。到了這個時候，巡防營杜統領帶着他的一營巡兵來了。若果徐錫麟真是個知兵的，馬上下決心把他的兵生三分之一守軍械局，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和杜統領的兵決鬥，或則有八九成可以操着勝算。因為從前巡防營的兵丁都是些老弱殘兵，只要一鼓作氣，就可把他們趕走，那時革命的火燄，也許多放一點。老徐，可惜是個書生，用現在革命黨人的話來說，就是機會主義的心理太厲害，妥協氣太重。他看見杜統領帶着兵來了，不知怎的，杜統領被兵生隊捉住了，帶到軍械局，徐錫麟勸他投降，杜是一個老營混子，當然滿口答應，陳伯平拔出槍來，要打死他，說他靠不住；徐錫麟不願

意將杜放了。杜統領出去以後，暫時把軍械局團團地圍着，按兵不動。但是不多一回，他的兵調齊了，新軍的隊伍也從北門東門開進城，齊向軍械局包圍徐錫麟，沒有兩個時辰，兵生便逃的逃，俘虜的俘虜，繳械的繳械；陳伯平當場戰死；徐錫麟是在軍械局旁一個民房裏捕獲的。（馬志希被捕在此案已了之後幾日。）前清的舊例，撫台一出缺，藩台馬上護理。當時安徽藩台是馮煦，恩撫台被刺，抬到撫台衙門以後，已經氣絕，又有一說，還經過一次手術，總而言之，不久即死。徐錫麟就囚在撫台衙門的花園裏一個涼亭中。那天夜間三司會審的時候，徐錫麟對着安徽臬台毓祿（滿人）笑道：「昨天便宜了你了！」毓祿面色如紙地欠身答道：「我不配！我不配！」

馮煦既接護撫印，那麼處理這一「大逆不道」的案件，煞費苦心。

他以「照張文祥刺殺馬制台的舊例處治徐錫麟」電奏清廷，清廷覆旨照准。所謂「張文祥刺殺馬制台的例」就是把犯人開腸剖肚挖心砍頭。心是挖了，但是同張文祥的挖心不同。張文祥是先挖心，後砍頭；徐錫麟是先砍頭，後挖心。當時的滿官和老恩的家屬因此大大地非難馮煦。這是一。

馮煦的意思：徐錫麟既然一力承當，所有其他一切嫌疑犯，均以「脅從罔誅」四字，網開三面，免得株連。好事者又多不以為然，然而老馮終於不肯妄殺一人，而警察學堂的數百兵生幾十個教職員都得安然無事。這是二。

而且還有一層很難得的，自來統治階級捉到革命黨，把他殺了，還要造出許多謠言，說革命黨人被捕以後，怎樣叩頭求饒，怎樣可憐，怎樣

沒有骨氣，窺其意不過是要把革命黨人在民衆中的信仰消滅乾淨，免得激動人心，留爲後患。馮煦當時在文告上，在事實上都不曾撒出這種爛污。這是三。

他不但造謠言去侮蔑革命黨，並且對於徐錫麟之爲人，非常欽佩，我們於他收藏徐氏遺物一事，可以斷定。原來徐氏被殺以後，所有衣物都被馮煦派人收取，特在大觀亭後身建築西式樓房三楹，陳徐氏遺物，以示紀念。亭在安慶南門外，大江滔滔，日夜流檻，下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全城遊人多流連於其間。亭前有元余闕墓，亭中的名人題詠很多。後來，亡友韓著伯先生在安徽督練公所當文案，馮煦就請他代做一聯以寄慨，並告韓以「定哀之世，宜多微言。」韓會其意，撰聯如下：

「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

英靈不昧，鑒茲蹇蹇匪躬愚。」

這個對聯有兩個寓意：一方面是說，徐錫麟刺殺恩撫案件他雖殺了徐氏，卻有無限的同情心，且當時之出此，也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徐烈士地下有知，要請他加以原諒。一方面是表示他對於時局的歎歎感憾之情。他的下意識已經感覺到清廷命運的將斬國勢的凌夷，人心的卑下，所謂「對此茫茫百端集」者是也。而其主要意旨還是在紀念徐錫麟而致其哀毀悲痛之詞。我記得老韓自己也有一首紀念徐烈士的詩如下：

「碧血藏來土未乾，

百年城郭有餘寒；

此身雖化干將去，

心似洪爐在世間。」

徐錫麟被殺以後，牠的餘波波及到浙江，因為他和秋瑾女士是同謀的，在他的文件中，搜出他們秘謀的證據，於是安徽巡撫電告浙江巡撫，把秋瑾女士殺了。

我們已經說過，徐錫麟原定計畫，預備把恩撫台及其他擁護滿洲政府的官吏聚而殲之，不料事機不密，老恩把畢業日期提前，他的兄弟從日本趕回來，預備到安慶參加他的革命戰鬥，但是日期誤了，等他坐輪船到安慶，徐氏已失敗身死，他因此被捕下獄，以各方面的營救，判了個永遠監禁，沒有殺他。直到辛亥革命，安慶獨立，他才從安慶懷寧的巴士提爾裏出來！

書

信

白話書信 高語罕著 八角

知行書信 陶知行著 五角

理論與實踐 高語罕著 一元一角

柴霍夫書信集 程萬孚譯 九角

歐洲近二百年名人情書 魏蘭女士譯 正續集各七角五分

現代情書 張其柯編 一·二·三集，各四角五分

三葉集 田壽昌 郭沫若 宗白華 著 合著 三角五分

紀念碑 蔣光慈 宋若瑜 著 合著 五角五分

亞東圖書館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出版

百花亭畔

(如此這般錄一)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有著作
不許翻印

著者 高語罕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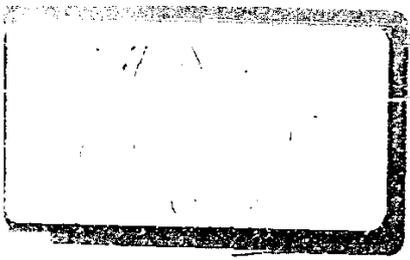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2000

